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6年 · 第2期 · 总期: 180 + S\$5.00



携手同行 推动华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黄循财总理与宗乡总会领袖午餐会

- 在军营中成长的笛子手、指挥及音乐总监——郑顺发少校
- 花儿，静静地绽放——女画家李文彦的艺术
- 当19岁的主编遇上160岁的公会



我的新加坡声音
MY SINGAPORE VOICE

微电影大赛
MICRO FILM COMPETITION

丰厚奖金等待赢取!

UP TO
\$30,000
worth of cash prizes to be won!

意向报名截止日期 Register for Interest Deadline

31.12.2025

作品提交截止日期 Entry Submission Deadline

28.06.2026

参赛组别 Competition Categories

公开组、学生组 Open, Student

大赛小贴士! Competition Tips!

- ◆ 意向报名, 获取更多资讯!
Register your interest for more updates!
- ◆ 影片, 横竖都能提交!
Submit your entries in either portrait or landscape!
- ◆ 扫码了解更多详情!
Scan to find out more!





编辑语

文·欧雅丽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春天本是万物萌发、草木新生的季节，而在四季如夏的新加坡，我们虽难以感知气候的更迭，却依然可以在时间与文化的流动中，触摸到“春”的气息——那是一种更新、延续与生长的力量。

本期杂志所呈现的，正是一幅跨越代际的文化春景。本期专访的前辈人物，是这片土地上最早播种的人。他们在资源匮乏、环境未成之际，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年代里，一点一滴耕耘出今日的文化茂林。作家谢克笔耕不辍，同时悉心栽培新一代作家；领军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艺术团的郑顺发少校致力于音乐推广，为新加坡乐坛培养众多英才；古老社团醉花林，在总理黄海庆的带领下，不懈推动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走近传统，使文化得以延续、再生；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的守护者陈兴庭，通过支持华文导读，不仅传承华族文化，也探索人文与科学的精神。

黄循财总理首次以赞助人的身份到访宗乡总会，与宗乡总会领导层共进午餐并深入交流，彰显政府与民间携手同行、共促华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共识，为本地文化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与此同时，春意也在年轻一代中悄然萌发。19岁的郭璟佚以一己之力梳理160岁的凤廓汾阳公会历史，让濒临流失的记忆重新被看见；符岂华在戏曲舞台上探索传承与创新的可能性，为古老艺术注入新生。这些行动或许微小，却如春芽破土，孕育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女性的身影，也为这幅春景增添了细腻而坚韧的色彩。无论是在家庭与艺术之间寻求平衡的画家李文彦，还是在厦门公会“闽南讲坛”上探讨女性在闽南文化传承中的力量的讲者，她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文化注入春意。

春天未必只存在于季节，它也存在于一代代人的守护与接力之中。在这片没有四季分明的土地上，文化正如常青之树，在时间深处悄然抽枝发叶。愿我们在阅读本期杂志时，也能感受到那份属于“春”的生机与希望。

2026年·第2期·总期：180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总编辑■

欧雅丽

■编辑■

陈洁莹

■英文校对■

何秀菱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DDI (P) 063/11/2025

■出版■

2026年4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會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野菜在舌尖奏乐 尤今
—— 传统马来野菜拼盘
- p 7 艺术长廊 花儿，静静地绽放 赵宏
—— 女画家李文彦的艺术
- 12 文坛掠影 从小说作者到文艺园丁 齐亚蓉
—— 谢克专访
- 17 余音缭绕 在军营中成长的笛子手、指挥及音乐总监 郭永秀
—— 郑顺发少校
- 22 戏如人生 从龙套到挑梁 章秋燕
—— 符岂华的戏曲之路
- p 27 社团聚焦 当19岁的主编遇上160岁的公会 陈洁莹
- p 30 家后：闽南女性的力量 林美幼
—— 记第三届“闽南文化在新加坡”之“闽女讲坛”





p.12 文坛掠影



p.17 余音缭绕



p.22 戏如人生

- p 32** 总会专递 携手同行 推动华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欧雅丽
—— 黄循财总理与宗乡总会领袖午餐会
- p 34** 狮城艺事 诚信成就了黄海庆的睿智人生 蔡曙鹏
- p 38** 吾乡吾族 鼓浪屿姑娘的新加坡人生：林文庆夫人殷碧霞 陈煜
- p 42** 人物景点 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的守护人——陈兴庭 王英弘
- p 46** 岛国记忆 新加坡先贤：慈善家颜永成 何乃强
- p 48** 喃呒师傅“诠真堂”与胡家三代记 庾滩诚
- p 50** 文化百科 碧山亭万缘胜会 蔡志祥
- p 53** 艺文脉动 狮城古琴展 慕古雅逸韵 润佳
- p 56** 仿佛风 绕圈 王妍柔
- p 57** 迷离 刘锦汶
- p 58** 本土文学 烟火松柏：记一条老街的余温 黄义强
- p 60** 旧貌新颜 德普路：南部山脊军需仓库的层叠记忆 李国樑



野菜在舌尖奏乐 传统马来野菜拼盘



文·尤今

这天，鲜艳的阳光洒落在吉隆坡这个人潮熙熙攘攘的繁华大城里，显得格外活泼。

老马识途的阿丽娜·阿卜杜拉（Alleena Abdullah，以下简称阿丽娜）偕同我来到闹市里一处售卖杂菜饭的小摊子，她与摊主西蒂寒暄几句后，便满脸期待地问道：“今天有Ulam吗？”西蒂点头答道：“有啊，你要几份？”阿丽娜立刻高兴地说：“来两份吧！”

所谓Ulam（马来语），指的是马来野菜拼盘——将香草、嫩叶、野菜、蔬果或豆类“现摘

现洗”，直接生食。这是马来传统饮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一般也被称为“甘榜沙拉”。它既体现了马来饮食贴近自然、清新质朴的特色，也反映了传统生活中“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那一大盘“Ulam”端上来时，绿意盎然，赏心悦目哪！盘中摆放着八种不同的野菜和豆子，新鲜得仿佛还夹带着泥土与露水的气息。说来惭愧，我仔细辨认，却只认得常见的臭豆和薄荷叶。阿丽娜不厌其烦地教我一一加以辨识：皇帝菜（Ulam Raja）、西芹叶（Daun Selum）、四棱豆（Kacang Botol）、积雪草（Pegaga

Kampung)、鸟栖草 (Tenggek Burung)、蕨菜嫩芽 (Pucuk Paku)。

阿丽娜表示，这些Ulam，有些是野生的，有些则是有机栽种的，不沾化肥，可以放心生食。说着，她用手抓起了一把积雪草配上薄荷叶，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品尝。吞咽之后，她满脸陶醉地对我说道：

“许多人喜欢将Ulam搭配参巴 (Sambal) 辣椒酱一起吃，可我更喜欢野菜的原味——酸甜苦辣，各有千秋。它们的滋味不是大鸣大放、嚣张外露的；而是含蓄内敛、细细溢出的，必须慢慢品尝，才能品出它们的精华。此外，这一大盘Ulam看起来好像杂乱无章的样子，然而，摊主西蒂绝对不是胡乱拼凑的。Ulam讲究的是味道的平衡——有的清甜、有的清香；有的微辛、有的微涩；有的带甘、有的带苦，层次丰富、百味麇集，百吃不厌。同时，Ulam也要兼顾不同食材的质地——软的、硬的、脆的、韧的、嫩的，必须互相协调。西蒂精于此道，总能把应时的野菜与香草配搭得恰到好处，吃起来清脆爽口，齿颊留香；所以呀，尽管这里饮食环境拥挤而又闷热，我还是心甘情愿地老远跑来这儿享用。我常常吃得大汗淋漓，但却乐在其中。”

我原以为Ulam难免夹杂苦涩的草腥味。然而，当我把眼前那一大盘野菜慢慢地吃个精光之后，才惊喜地发现，Ulam就像一支交响乐团，每一种野菜，都宛如一件截然不同的乐器，在舌尖上奏出各自精彩却又无比和谐的味道。更令人难忘的是，这一餐，没有荤食的“干扰”，餐后整个人竟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

阿丽娜听了高兴地说：

“Ulam的确会让人上瘾。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浑浊的世界里，许多食材受到环境污染，味精又充斥在大大小小的餐馆内。Ulam就像一股清纯的山泉，能够好好地涤荡我们的五脏六腑。”

“你通常多久吃一次Ulam呢？”我问。

“我每周至少要吃两次呢！”

阿丽娜告诉我，一般餐馆的菜单上很少设有Ulam。可叹的是，如今供应Ulam的小食摊也越来越少了。即便像西蒂的摊子，也不是天天都

有。食材来源有限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在食物五花八门的大城市里，Ulam这种质朴清纯的马来传统食物已渐渐日落西山。供与求既然失衡，西蒂自然不会天天准备Ulam来守株待兔了。

“售卖肉类和海鲜杂菜饭，才是西蒂真正的营生。”阿丽娜说，“她兼卖Ulam，其实是借此回馈一些长期支持她的老顾客。”

阿丽娜接着指出，Ulam是马来土著祖传的饮食文化，蕴藏着闪亮的智慧。在乡村地区，处处长满野菜，随摘随有，家家户户每天的餐桌上都会出现一大盘Ulam。

“有些野菜是有毒的，会不会有人因为误食而送命呢？”我好奇地问。

“哪一种野菜可食，哪一种不可沾唇，全都是先辈流传下来的常识，我们这些后辈只是坐享其成罢了。”阿丽娜微笑着说，“有时候，我在丛林里看到一些陌生的野菜，也会好奇地摘来尝一尝。不过我通常只会实验性地试一点点。如果味道很好，吃过之后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我们就知道这是大自然赐予的美食。反之，如果身体出现异常反应，就算再美味，也会敬而远之。我们的身体，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阿丽娜祖居在芙蓉，屋子后面有个很大的庭院。她的祖母把丛林里几十种可食用的植物引进庭院里栽种，长成之后，随摘随吃。这些植物不但美味，还具有养生功效哪！

忆述往事时，阿丽娜脸上的笑意如风云涌动：

“祖母一面教我辨识各类植物，一面给我灌输有关保健的常识，她可以说是我的生物启蒙老师呢！在她的教导下，我知道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保健作用。比如说，皇帝菜能促进血液循环，也有助于控制血糖；臭豆能帮助肠道蠕动、缓解便秘；西芹叶能降血压、利尿、帮助排水；四棱豆含铁质，可以改善贫血；积雪草可抗焦虑、具镇静功效；鸟栖草能缓解风湿，还具有抗炎作用。你看看，一大盘Ulam吃下肚，不但满足了味蕾的享受，还促进了健康，一举两得啊！”（注：有关保健的确实性，尚有待进一步查证。）

童年时，阿丽娜最喜欢祖母牵着她的小手，到庭院里采摘制作Ulam的食材。那感觉就像现在的孩子玩积木——他们拼出与众不同的图案而感到骄傲；而她，则为拼出一盘盘令人垂涎的Ulam而深感自豪。

她意兴勃勃地说：

“每天拼出的Ulam都不一样，因此，我对每天的餐食都有新的憧憬。”

阿丽娜透露，在乡村长大的马来人，对Ulam往往有两极化的感受。有些人觉得这是唾手可得的食品，毫不珍惜。在他们心中，乡里乡气的Ulam是粗糙的食品，一旦有机会到城市工作，便弃如敝屣。甚至当别人提起Ulam时，他们会嗤之以鼻地说：“那东西啊，我不吃！”

也有些人，原本很喜欢Ulam，但到了城市之后，尝遍如烟花绽放般的新口味，味蕾从单纯变得繁丽，再回头吃Ulam，便觉得淡然无味，不再想碰。

至于阿丽娜呢，小时爱，如今人到中年，更加爱。

她语重心长地说道：

“Ulam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传统食品，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好好保护、维护、传承、传扬。”

从芙蓉来到吉隆坡工作之后，阿丽娜遗憾地发现，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对营养价值不高的快餐趋之若鹜，却对Ulam一无所知。

阿丽娜感慨万千地说道：

“Ulam是金子银子呀，他们偏偏喜欢破铜烂铁，奈何！”说着，她的语调渐趋低沉：“在都市紧张的生活节奏中，许多优良的价值也渐渐淡化了，比方说，甘榜那种互助合作的精神，在城市里几乎荡然无存了。”

不过，现在，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一些昔日在乡村成长、如今定居城市的人，也抱着返璞归真的心态，希望把Ulam重新带回餐桌。

阿丽娜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今年开始，有人把传统马来野菜拼盘，以“捞起”的形式与华人一起庆祝新年。当一双双长长的筷子

将翠绿的野菜高高夹起，伴随着一句句祝福的话语，将浓烈的新年气氛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时，华人与马来人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分彼此地交融在一起了。

午餐过后，阿丽娜带我参观闹市中的一个小园圃——“Eats Shoots&Roots”（“食芽根”园圃）。

园圃管理员肖恩介绍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区发展项目，旨在推广“从种植到生活、从园圃到餐桌”的健康理念。

该组织成立于2012年，怀着一个深远的目标：让城市居民了解可食性植物的生长过程，从而重新与自然建立亲密的关系，同时也提升城市的绿化面貌。

“Eats Shoots&Roots”种植了几十种可食性植物、果树与草本植物，包括四棱豆、茄子、毛豆、红花长豆、白萝卜、马拉巴菠菜、锯齿香菜、泰式罗勒、迷迭香、薄荷、蝶豆花、芦荟、辣木、玉米、香蕉树、木瓜树等等，种类丰富。

这些瓜果蔬菜与香草，可蒸煮、煎炒、凉拌、腌制、焯水、入汤，其中也有不少可以用作Ulam的生食植物。对于喜欢健康饮食的人来说，这个应有尽有的园圃，简直就是“食材的天堂”啊！我大开眼界，心生欢喜。

离开前，肖恩希望让我亲自体验栽种植物的乐趣，他问我：

“你想种什么呢？”

毫无经验的我，选择了容易生长的薄荷。

肖恩拿出一个塑料花盆，剪下一段大约十厘米长的健康枝条递给我。我把泥土轻轻弄松，剪掉枝条底部的叶子，小心翼翼地把这根纤细的枝条插进泥土里。

当双手触及那柔软湿润的泥土时，我强烈地感觉，枝条虽瘦，却饱含着长成一株茂盛薄荷的强大欲望。那股厚实而丰沛的生命力呵，就在我十指之间窜动、跃动，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薄荷那清冽沁心的香气……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花儿，静静地绽放

女画家李文彦的艺术



文·赵宏
图·受访者提供

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花儿，静静地绽放，
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
多想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都是爱着你，
站在你身后，孤独地美丽。

2025年7月，位于威基路（Wilkie Road）的新加坡私人美术馆（The Private Museum）举办大型纪念回顾展——《真爱：李文彦、蔡名智艺术展》。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总理黄循财以贵宾身份莅临开幕现场，以国家最高行政领导者的身份向这两位新加坡艺术大师致敬，日后还在

2025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特别提到从李文彦、蔡名智夫妇的画作上深切感受到家国情怀。

画为媒

这大概是女画家李文彦（Lee Boon Ngan, 1939-2017）参与过的最为重要的一次展览，可惜依然不是她独享荣耀的个人艺术展，而且她也已经不能亲眼看到，不能亲自盛装出席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新加坡最富盛名的写实派画家蔡名智的妻子，李文彦的画作和艺术成就一直未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与认识，只有一小部分与他们交往密切的人知道她是一位出色的画家。蔡扬医生（Dr Chua Yang）是本次展览的主要



李文彦与其作品合影



李文彦、蔡名智1990年代在香港



蔡名智作品《吾妻》布面油画 130X90cm (1980)

策展人之一，她为母亲感到骄傲，也深深遗憾。在外人眼里，李文彦似乎一直都生活在蔡名智的盛名之下，然而，她本人的艺术成就是相当出色的，以至于蔡名智在很多场合曾多次提及李文彦高超的技巧和画面表现，并且自1980年代前后就不再画花卉了，以此向李文彦表示敬意。李文彦是有朴素情怀的画家，大概也是新加坡画坛上唯一以花卉这一单项主题而确立艺术地位的。

李文彦是温柔可人的妻子与耐心、细心的母亲，唯独没有做专业画家的奢望与梦想。她从始至终都不在乎画家的名头，笃信成功的概念应该自己定义。她内心强大、自信，丝毫不觉得自

己不成功，对生活感到满足，没有遗憾。事实上，很多艺术品收藏家都买过她的画，往往是来家中挑选蔡名智画作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后就一下子喜欢上了，高度认可，甚至追捧。菲律宾的一位总统也曾收藏她的作品——李文彦其实一直不乏观众。

在一个静静的下午，我在展览现场见到蔡扬医生。她面容姣好，白衣红裤，直言快语，知性大方。与其说这是一次以夫妻名义的作品回顾展，倒不如说是蔡名智和蔡扬父女二人向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李文彦的特别致敬，是一场终极的艺术对话。

李文彦在1961年与蔡名智结婚，相濡以沫56载。两人通常会一起作画，大多数是在家中的画室里。但即便这样，每天清晨，他们依旧穿戴整齐，就像要出门工作一样。尽管近在咫尺，只是跨越几步的距离就可以走到，他们彼此认真地打招呼，然后开始各自的工作——画画。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自省的生活不值得存在。这种有意识的仪式感，一方面是画家的自我心理认同与暗示，一方面也是在提醒自己，即使周围的物理空间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生活的内容与意义却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分割下而变得不同。这种自省与自控的生活，是理性思考与生活态度的选择间的平衡，是一种智识的决定。从这种智识出发，生活在当下，仿佛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般。这意味着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他们都会尽力地观看这个世界，从对事物惯常的、固有的成规观念里摆脱出来，重新找到对现实的一种天然的、纯真的看法。如此，作为艺术家的两个人便能觉察普通人平常未曾留意的世界的光采。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所谓纯真之眼，就是好奇的心；所谓赤子之心，即为自省之力。

据蔡扬医生回忆，父母总是出现在家中的画室里，在独属于他们各自的角落安静作画。李文彦通常采用自然光线，是典型的外光画法。她会在靠近窗户的地方摆放画架，只有在光线适合的时候才动笔。清晨的阳光似乎可以穿透画布上的颜料，花瓣就像半透明的一样。蔡名智秉持画面是视觉的传达和感知的理念，强调画家的主体介入性，表现主观动态调整后的变化和表现。因此，他的画面光线往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蔡名智一般是在画室的中央安放灯光，以人为设置的光源为模特或绘画对象打光，因此对一

天之中自然光线的强弱变化和射入角度并不十分在意。他曾说过，“画家集剧作者、导演、演员于一身，可以自由塑造人物的形象。为了成就真实感，画家必须编构叙述脚本，选角、设定布景及删除具干扰性的元素，画作可被视为形诸绘画的纪录片。”^[1]这其实是十分严肃的学术判断——戏剧性是古典主义绘画的最高境界。同时，绘画天然的是极其主观的人类精神与审美活动，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陈明教授曾指出，绘画中的真实比真实更真实。

他们通常都非常专注于各自的主题，不随意聊天，蔡名智偶尔会把收音机调至FM92.4频道，低声地播放一些舒缓的古典音乐，同时也避免引起过度的情绪波动。李文彦大多数情况下是选择安静，无声无息。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精心构造的审美世界里，安稳地作画，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甚至心跳，在默默无语的静谧中，相互信任、鼓励、慰藉。不过，李文彦的作画时间是间断的，每次绘画的时间长度也相对有限，因为她要操持家务；蔡名智则不同，有了妻子的照顾，他几乎可以一整天画下去，除非吃饭或茶歇小憩。蔡名智一生中曾多次以李文彦为模特作画，也为她做过雕塑。如今，这些作品早已成为新加坡历史和美术史上不朽的经典记录。

李文彦与蔡名智相识于1952年，这都源于她的哥哥李文苑（Lee Boon Wang），一位有主见的艺术青年。李文苑与蔡名智崇信绘画中的写实主义，经常见面讨论、作画、写生，捕捉日常生活场景和周围环境中形形色色的真实人物。蔡名智说：“一个真正能负起伟大而艰巨的使命的画家，毫无疑问，他必须是一个准确和深入刻画社会人物精神面貌的能手。”^[2]

在一个平常的午后，蔡名智来找李文苑，碰巧遇见了李文苑的小妹李文彦。初见之下，李文彦即给蔡名智留下极深的印象，就被眼前优雅宁静的少女所吸引。彼时李文彦用潮州方言对蔡名智说的第一句话是：“名智兄，喝咖啡”^[3]。

李文彦出生于一个大家庭，父亲做工，母亲居家维持日常，住在榜鹅尾。她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弟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早年读圣婴小学。弟弟李文献是兽医，后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部长。李文彦从小喜欢看书，尤其是中医书和菜谱，对花情有独钟，这也是她为什么日后喜欢画

花的原因。她喜欢靠窗画画，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在四溢的花香和清新的空气中。她有着花一样的性格，与世无争，一直都是在安静地绽放，不争不抢。也许是语文偏好的缘故，李文彦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沉默的。尽管寡言，她还是开心的，也有幽默感。

花为媒

李文彦1961年至1965年间在南洋美专学习，但显然她的创作受蔡名智和李文苑影响更多。花卉通常不是西洋画创作中的独立主题，多是伴生的辅助表达元素。但在绘画训练中，不少画家也会专注于花卉，尤其是创作静物作品时。静物画的主体除了花儿之外，往往还有另外一些配合展示的物品，如花瓶、首饰、蔬果等，例如梵高的《向日葵》（1888年）和《鸢尾花》（1889年）。亨利·方丹·拉图尔也创作过《玫瑰与野百合》。在传统中国画中，花鸟画是重要的一类，名为花鸟，有时候却仅以花卉自身呈现，不表现配套的其他细节元素，这与西方静物油画是很不同的。因此，可以推测李文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画创作理念影响。李文彦笔触细腻，调色水平高，采用薄涂技法，色彩变化精确，光线感强。画面的背景往往做虚化处理，突出前景，以递进的写实表现手法，形成层次和景深。早期蔡名智的画面常有一种米棕色的暖色调，但李文彦无论是1990年代还是后期，始终是鲜艳和明亮的。她画的花充满活力，饱满丰盈，富有动感，体现着巴洛克艺术对感官冲击力的极致追求。

17至18世纪，花卉画在荷兰和佛兰德斯地区（或称西属尼德兰）尤为繁荣，被称为“荷兰黄金时代的花卉静物画”。彼时画家以极其惊

李文彦作品《牡丹》布面油画 59X90cm (1995)



人的写实技巧，精细地描绘花瓣的纹理、露珠的晶莹、昆虫的翅膀，甚至叶片上的虫洞，这与当时盛行的植物学密切相关。花卉本身也有深刻的象征主义，比如玫瑰，象征圣母玛利亚的爱与纯洁；郁金香象征财富、短暂与虚荣；向日葵象征忠诚与对上帝的追随；昆虫或枯萎的花朵，暗示生命的短暂与死亡的必然。因此，一幅看似简单的花卉画，其实是一次关于生命、死亡、财富、信仰等人生深刻主题的复杂寓言与解读。画家们在卡拉瓦乔主义的影响之下，巧妙运用强烈的明暗对比，让光线从一侧照射进来，照亮鲜艳的花朵，同时在背景投下深沉的阴影，营造出戏剧性的、三维的舞台效果，让花朵看上去更加立体、鲜活、光艳夺目。名冠西方美术史的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de Oude）是花卉静物的旗帜人物，享誉天下。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被赞为美国“现代主义花卉画之母”，她将花朵极度放大，充满整个画面，创造出一种抽象、性感、富有力量的意

向，例如她的作品《红色罂粟花》和《黑色鸢尾花》。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则大胆地用丝网印刷技术重复排列鲜艳的花朵，模糊了艺术与商业的边界。

分析李文彦的作品意境时，上述理论与传统是绕不开的。表面上她在画花，实质上是深刻而抽象的理性暗示。早期李文彦的作品尺幅都比较小，因为她只愿意利用蔡名智裁制画布后的边角余料，节省开支，直到1990年代之后她才慢慢开始画大画。她的作品一直有人喜欢和收藏，也零星参与过一些女画家的联合展览，但从未举办过个人展览。

平凡即真实，平常即永恒

李文彦是潮州人，典型的好妈妈，很会照顾人，细心且极有耐心。有时候，为了买到一条好鱼，她会连续跑三个菜市。晚餐的时候，她会特别为蔡扬和她的哥哥蔡宏准备饭菜，每次都要等女儿回家之后才开始蒸鱼，就是为了恰到好处

艺为媒——艺术展赞助人张东孝

在美术史的范畴里，艺术家与艺术赞助人总是不可分割的互动元素。被公认为“西方艺术史之父”的乔尔乔·瓦萨里曾说过，赞助人是天才的朋友与知音，他们识别未被看见的才华，为艺术提供尊严与空间；“古典考古学”与新古典主义的精神奠基人温克尔曼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高尚的艺术赞助是对美与德性的共同追求，赞助人与艺术家一同接近崇高。

此次《真爱：李文彦、蔡名智艺术展》在私人美术馆举行，幕后赞助人是新加坡著名地产商人、煌孝集团主席、建筑师张东孝（Daniel

Teo Tong How, 1943-）。他自幼喜爱艺术，长期支持本地艺术家，是新加坡重要的艺术推手之一。新加坡早期第一位向国家博物馆捐赠的艺术赞助人是商业大亨陆运涛（Loke Wan Tho）。私人美术馆是慈善机构，经常举办专业美术展览，有时也会向私人收藏家、政府机构和国家美术馆借来精彩展品，让普通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欣赏，例如本次展览，一半以上作品借展自蔡名智家族私人收藏。

在南洋女子中学附小读书时，张东孝的风景画作业曾在学校的展览会上展示过。1960年代，他在澳洲墨尔本大学攻读建筑学，也是出于对艺术的偏爱。2009年，他租下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51号及奎因街（Queen Street）222号原公教中学（Catholic High School）旧址（这里曾是他中学读书的地方），以约200万新元加以改造，建成一座综合艺术中心，并在二楼的一个单位创办“私人美术馆”，主要收藏全球范围内的现当代艺术品，也包括新加坡本土艺术家，如蔡逸溪等人的经典创作。他的夫人吴素芹（Goh Soo Khim）是开创新加坡芭蕾舞事业的先驱，1981年获颁文化奖。



张东孝

地掌控火候，让她吃到最美的味道。

李文彦的成功是丈夫和两个孩子，她对自己的衡量也不以社会的定义而定义。据此来看，新加坡知名女画家这个名号，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注释：

- [1] 黄向京，《蔡名智个展“映真”，写实艺术追求真善美》，《联合早报》，2021年11月27日。
- [2] 同注[1]
- [3] Chua Mia Tee, *The Art of Chua Mia Tee: A Portrait of a Life's Work*,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GB), 2018年10月出版。
- [4] 张东孝口述、柯木林、林孝胜编著《商业艺术同荣——张东孝回忆录》，八方文化工作室出版，2021年10月初版。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西方美术史博士。本文部分内容源自作者在私人美术馆对 Dr Chua Yang 和 Mr Daniel Teo 的现场采访记录)

张东孝出身于一个令人瞩目的大家族，他曾坦言母亲的家族似乎比父亲的家族更为新加坡人所知晓。张东孝的舅公林谋胜少将 (Lim Bo Seng, 1909-1944) 是新加坡日据时期牺牲的最高阶军官，隶属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联合组织的特别部队——136部队，于1944年不幸被俘于马来西亚霹靂州，历经酷刑后在华都牙惹监狱遇害殉国。张东孝的外曾祖父林路 (Lim Loh, 1851-1929) 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早期华人南下，过番拓土，建功立业的先驱，曾于1900年获封福建花翎道，官二品头衔，不少新加坡重要历史建筑遗存，如“维多利亚纪念堂和剧院 (Victoria Memorial Hall)、旧国会大厦 (Old Parliament House)、凤山寺 (Hong San See Temple)、良木园大酒店 (Goodwood Park Hotel) 等”^[4] 都是他旗下公司杰作。位于中国福建南安县的“林路大厝”是林路的旧宅，目前是中国政府登记在册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Lee Boon Ngan, The Painter Who Loved Flowers

In July 2025, The Private Museum located on Wilkie Road in Singapore held a major retrospective art exhibition titled, "The Art of Lee Boon Ngan: Celebrating 60 Years of Singapore through the Love of Chua Mia Tee & Lee Boon Ngan". Prime Minister Lawrence Wong attended the opening as the guest of honour, paying tribute to the two masters in his role as Singapore's leader of government. Subsequently, during his National Day Rally address that year, he specifically highlighted the profound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and patriotism he felt conveyed in the paintings of Lee Boon Ngan and Chua Mia Tee.

For the female artist Lee Boon Ngan (1939-2017), this was likely the most significant exhibition she had ever been part of. Nonetheless it was still not a solo exhibition where she could gain recognition solely for her own accomplishments. Nor was she able to witness the moment or participate in the opening dressed in her finest attire. Regrettably, Lee Boon Ngan, the wife of Chua Mia Tee—one of Singapore's most renowned realist artists—never garnered the recognition her own works and artistic accomplishments they deserved. Only a limited group of people close to the couple knew that she was an exceptional artist. Dr Chua Yang, one of the curators of the exhibition, experience immense pride in her mother alongside profound sadness over this long-standing neglect.

To many outsiders, Lee Boon Ngan seemed to have existed consistently in the shadow of Chua Mia Tee's fame. However, her artistic achievements were remarkable in their own way. Chua Mia Tee commended her technique and expressive strength frequently in public on numerous occasions, even halting his flower paintings in the 1980s as a gesture of respect for her mastery. With a humble and genuine spirit, Lee Boon Ngan might have been the sole artist in Singapore to have established her artistic identity and reputation predominantly through the theme of flowers.

As a gentle and gracious wife and a patient, detailed-oriented mother, she harboured no grand ambitions or desire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artist. Sh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itles, strongly believed that "success" ought to be determined by oneself. She possessed strength and a subtle confidence, never feeling inadequacy—satisfied with her life and without regrets. Many art collectors encountered her paintings initially when they visited the home to acquire artworks by Chua Mia Tee, only to be captivated instantly by the brilliance of her art. They praised her generously and some even turned into loyal fans. A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once collected her work—indeed, she always had collectors and an appreciative audience.

Lee Boon Ngan married Chua Mia Tee in 1961, and the couple remained devoted to each other for 56 years. They often worked on paintings side by side in their home studio. Yet every morning, they dressed neatly, as if preparing themselves to go out to work, even though the rooms were just short distance apart. They greeted one another with earnest formality before beginning their day's work—painting. Socrates is well-known for stating that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For them, this conscious sense of ritual, served as both a way of self-affirmation and a reminder of their purpose. It symbolised that even i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stay unchanged, the significance and essence of life could still evolve with time and purpose. Their life of self-reflection and self-discipline was a balance between rational thinking and a grounded, realistic perspective in everyday life—a profoundly intellectual decision. From that subtle insight arose a way of existence: to experience every moment as if observing the world for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ime.

从小说作者 到文艺园丁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谢克专访

超龄小学生

1931年8月24日，祖籍潮州澄海的余克泉出生于俗称柴船头的新加坡河畔，那里是潮州人的聚居地。

克泉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父亲在新巴刹（建于1899年，毁于1968年）做小贩。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伴随着弟妹们的相继出世（他有六个弟弟，五个妹妹），克泉一天天成长起来。

1941年年初，已然迈入第10个年头的克泉成为一名小学生。他就读的陶英小学设备简陋，规模小，班里仅有二三十人。入学前，他曾跟着一位老先生读过一段时间私塾，算是有点儿基础。

一年后，日军入侵，学校关闭。其时的克泉一家搬去了后港，他常常从后港走去大坡（新加坡河南岸），帮父亲卖猪肉。

日军投降后（1946年），克泉转入位于登路（Tank Road）的端蒙小学继续学业。在那里，他遇到了首批南来的先驱水墨水彩画家陈宗瑞（1910-1985）老师。陈老师教学生华文和美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克泉又转去位于经禧路的启发小学就读，至小学毕业。

中正遇恩师

1949年，克泉进入位于金炎路的中正分校读初中。

在这里，他遇到一批爱好文学创作且已颇具

盛名的华文老师。他们经常介绍新出版的文学书籍给同学们，也鼓励爱好写作的同学投稿，加上每学期一次的全校学生作文比赛，同学们的创作热情高涨起来。

克泉的写作兴趣就是在这种洋溢着文艺气氛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

初中一年级时，克泉的华文兼级任老师是长于写小说和戏剧的谢白寒。谢老师的口才全校闻名，但脾气不大好。一次上课时，他撕碎了一位吴姓同学在课堂上偷写的爱情小说。放学后，克泉趁机向这位同学“讨教”，由此对写作产生了兴趣。

初中二年级时，他写了一篇散文，托低一级的一位同学转给他的级任老师仝道章。一周后，那篇习作在仝老师主编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学生园地”刊出。

这一年，教克泉华文的是擅长散文创作的刘瑜老师。刘老师不但鼓励同学们写作，还帮他们修改准备投出的文稿。她跟邱新民老师是夫妻，邱老师也爱好写作，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星洲日报》出版的《星洲周刊》。这对夫妻为克泉树立了好榜样。

处女作发表之后，克泉又写了十多篇习作，投去《星洲日报》“星云”版，但只有三篇被采用。他不气馁，继续投稿《南洋商报》《南方晚报》及《星洲日报》文艺副刊。

由于动笔勤，他每个月总有几篇习作见报。

在同学的介绍下，克泉很快跟仝道章老师熟络起来，并不时去他位于芽笼13巷的住家讨教。

“要写别人没写过的。”正当而立的全老师这样指点这位喜爱写作的学生。

对于恩师的教诲，克泉铭刻于心并付诸实践。

那时的全老师身兼三职：上午在学校教书，下午去李玉荣（《南洋商报》老板）广告公司画广告，晚上编《星洲日报》“学生园地”。有时候，他也画电影广告，电影院会送他戏票。当哪位学生有作品发表时，他就送两张戏票给对方作为奖励。有作品发表，可以拿稿费，还有免费电影看，何乐而不为？！

相信尊称全道章先生为恩师的，绝非谢克一人。

此外，写历史小说的葛青凡（芝青）老师及写旧诗词的王梅窗老师对克泉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结缘名家刘以鬯

1952年，克泉进入位于月眠路的中正总校读高中。此时的他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有增无减，写稿、投稿于他而言已属常态。

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从香港来新加坡担任《益世报》文艺副刊主编的著名小说家刘以鬯先生。

那是一个星期天，《新力报》举办一个文艺讲座，主讲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刘先生。面对心仪的大作家，克泉冒昧上前打招呼，并成功得到对方的住址及联络电话号码。此后的每个星期天中午，他风雨不改地从中峇鲁前往丹戎巴葛柏城街南洋客属总会探望住在四楼的刘先生。

首次见面时，他便把一叠发表过的习作剪报送到对方手里。

刘先生除了指出习作中的不足，鼓励克泉多写，多读名家的作品，还为他开了一份中国小说家的名单。

于是，克泉从书店或图书馆买到或借到张天翼、蒋牧良、艾芜、沙汀、赵树理、吴组缃、姚雪垠、骆宾基、谷柳等名家的多部长、中及短篇小说，花了将近半年时间，认认真真全部读完。

刘以鬯先生无疑是他文学创作之路上的又一位领路人。

后来，刘先生搬到中峇鲁文冬

路附近的组屋，住在底层，时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世纪路”主编的著名小说家姚紫则住在同座组屋的四楼，克泉家就在他们所住组屋的后一座。

距离的缩短为克泉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不久，刘先生受聘出任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辑。从吉隆坡回到新加坡，他还邀克泉一同看电影。

为了向全道章及刘以鬯两位恩师致敬，刘全成为他的又一个笔名。

但当他用这个笔名投稿给《南洋商报》“世纪路”主编姚紫时，对方很不以为然，建议他用“余克”做笔名，克泉觉得“余克”的读音太过接近自己的原名，未采用。姚紫是福建人，常把“余克”念成“谢克”，“谢克”便出现在他主编的副刊上。谢克后来也就成为克泉的常用笔名。



谢克近影



1959年12月13日，谢克婚宴来宾合影，前排左起：苗秀、于沫我；
后排左起：姚紫、方修、李星可、苗芒、杜红、丘絮絮、抗抗、李汝琳、闻辛

步入文坛

1954年10月中旬，即将高中毕业的谢克从自己发表于《南洋商报》“世纪路”、“文风”（杏影主编）等文艺刊物的短篇小说中选出八篇，在同班同学张远和的赞助下，出版了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为了下一代》。

1955年，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困城》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六篇刻画小人物生活境况的作品。

1959年12月13日，谢克娶小一岁的蓝淑芳（小学老师）为妻，苗秀、于沫我、姚紫、方修、李星可、苗芒、杜红、丘絮絮、李汝琳等一众文坛宿将皆为婚宴座上客。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新加坡小景》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七篇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1962年，他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学成归来》出版。

此时的谢克已在教育界服务多年。步入社会的最初阶段，他曾在一所小学当书记，校长是文坛名人柳北岸的夫人，他也因此跟柳北岸结下了深情厚谊。

主编文艺副刊

1966年杪，《民报》社长黎国华有意增设一个纯文艺副刊——“新生代”，在柳北岸的力荐之下，谢克接下重任，兼任该副刊主编。

由于和文坛联系紧密，他成功邀约了不少名家，包括本地的苗秀、赵戎、苗芒、杜红、陈凡、柳北岸、姚紫、艾丽及马来西亚的林参天、方北方、韦晕、叶苔痕等为该栏目撰稿。就连历任《南洋商报》主笔、总编的连士生及《星洲日报》主笔的李星可也慨然赐稿。前者在“新生代”开设了专栏，后者则为该栏目写了不少寓言故事。

1969年，他主编的《新马文艺创作索引》出版。

他还把自己主编的《新生代》缩成十六开本，分四册影印出版，出版时间分别为1967、1968、1969、1970年。

1970年的某日，谢克在路上遇见恩师全道章先生。此时的全先生已是《南洋商报》执行编辑（后升任总编辑），他告诉谢克可以去《南洋商报》上班，并为他安排了面试。

那年的9月1日，谢克离开《民报》，加盟

《南洋商报》。他为新开启的副刊栏目取名“新年代”。

1970年9月14日，每周三次的“新年代”正式推出。谢克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我们欢迎成名作家为我们撰稿，也重视文坛新秀的作品。”

跟“新生代”一样，“新年代”除了得到成名作家的支持，不少年轻作者也积极投稿。

一个月后，作为“学生文艺作品专号”的“学府春秋”版推出，该栏目同样每周三次。

在主编《学府春秋》的十余年时间里，为了邀得学生的佳作，谢克亲自登门拜访十多间华校的校长——在推出某间学校学生专辑的同时，连同《校长的话》一起刊出。一时之间，一股浓浓的华文写作热潮在各学府间悄然弥漫开来。转瞬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跃跃欲试的学生作者如尤今、尤琴、林高、林锦、张曦娜、辛白、李永乐（冰点）、音涛（李宁强）、潘正镭、梁文福、柯思仁、伍木等，如今都已成了文坛宿将，谢克也因此享有“文艺园丁”的美誉。

此外，《南洋商报》也相继推出了《小说天地》《南洋小说》《星期文艺》《青年伴侣》《人文》等副刊，皆由谢克主编。

《小说天地》以刊载武侠小说为主（该栏目也刊登侦探小说及历史小说等）。谢克也因此跟被誉“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梁羽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此同时，他也跟刘以鬯取得联系，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对倒》《一九九七》《岛与半岛》及中篇小说《寺内》等，至1985年对方因创办《香港文学》（月刊）停止供稿。

1983年3月16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转入早报副刊组的谢克成为“文艺城”“书林”“星云”等栏目的主编，至1991年退休。

同年12月，他的评论集《新华文坛十五年》出版。

新华作家百人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黄孟文联系当时的名作家连士生、苗秀、姚紫等，发起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0年8月，该协会在里峇峇利路“风景楼”顶层宣告诞生，谢克是参会的14人之一（其他十三人包括连士生、李庭辉、苗秀、柳北岸、姚紫、赵戎、黄孟文、

杜红、周燦、苗芒、陈凡、麦青、钟祺）。

该协会成立后不久，黄孟文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钟祺与连士生又先后作古，加之其它一些客观原因，并未能开展任何活动。

1976年，黄孟文学成归来，即与几位执行理事商讨重组新加坡作家协会，易华文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1987年改回原名），同时适当修改协会章程，以吸纳更多年轻写作人入会。谢克为执行理事之一（其他执行理事包括田流、杜红、范北羚、林北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何家良总经理的大力支持下，教育部属下的“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新加坡文艺》半年刊。烈浦任执行编辑，编委会主席为杨松年博士，谢克为编委会成员之一（其他成员为王润华、骆明、杜诚）。《新加坡文艺》出版至第二十期时，为了便于申请“文化基金”，在何家良博士的建议下，由烈浦出面注册了“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十年后易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谢克为发起人之一（其他发起人包括杨松年、骆明及杜诚）。

1978年，他主编的《新年代散文选》由教育出版社及《南洋商报》联合出版。

此后的一二十年间，谢克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编文艺副刊，但他还是会受邀出任一些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如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金狮奖”小说组）、文艺协会设立的“新华文学奖”及“连士升文学奖”、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肯特岗文学奖”（小说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的“花踪”文学奖（小说组）、马来西亚乡联青总会主办的第六及第七届“乡青小说奖”、“新加坡青年短篇小说比赛”等。

1985年1月，刘以鬯创办了以推动世界文学为宗旨的《香港文学》（月刊），并从第二期开始，连续推出介绍其他地区华文作家作品的特辑。谢克于是写信建议刘先生为新加坡女作家出一个作品专辑，并于1988年年初开始帮忙组稿。

这年4月，由12位女作家的作品组成的《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辑》在《香港文学》第40期刊出。同年12月，《香港文学》第48期又推出了由18位作者执笔的《新加坡微型小说特辑》。

此后的六年时间里，《香港文学》陆续刊



谢克创作及主编的部分作品

出了《新加坡青年作家作品特辑》（第58期，11位作者）、《新加坡新诗特辑》（第70期，15位作者）、《新加坡文坛面面观》（第78期，8位作者）、《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辑》（第95期，9位作者）、《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特辑》（第105及112期，27位作者）。

这些特辑的组稿人皆为谢克。

1996年5月，谢克把这100位不同流派、不同文学团体、不同年龄层作者的作品集结成书，由新加坡报业集团设立的新闻业基金赞助出版，是为《新华作家百人集》。

2000年，他获“亚细安文学奖”。

2010年，他受邀到香港参与配合刘以鬯获得

香港书展“年度文学作家”而举行的“刘以鬯与谢克对谈在新加坡的生活”，畅谈两人多年的文学情谊，及刘以鬯50年代在新加坡的文学活动。

近十余年来，年事已高的谢克在含饴弄孙、莳花弄草中颐养天年，却也未曾远离文坛清风——他仍偶尔现身文学活动场所，与旧雨新知谈艺论道。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些当年在他悉心栽培下成长起来的成名作家，亦常登门探望这位已届耄耋的文艺园丁。茶香袅袅间，往事与近思交织，恍若又见那段他执笔为灯、扶植新绿的岁月。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早在六七年前，骆明即给了我谢克老先生的联络方式，我也顺利约好了采访时间。但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天，当我打电话过去确认时，老先生告诉我说他有事，要我一周后再跟他联系。但我已订好一周后回国探亲的机票，只好在回来后再次打给他。这一次，他说暂时不打算接受采访。

此后，我曾多次想再拨通那个号码，但伸出的手指总也无法断然按下。一拖再拖之下，也就渐渐失去了跟他联络的勇气。

此后不断有人问我有否写过谢克，我只

能告诉对方说希望有人帮我联络。两三年前，白荷说她可以帮我，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直至我的《文坛掠影（上）》新书发布会之后的那个周末，成君终于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那天成君载我去谢克家，并陪我完成了采访。老先生精神矍铄，声如洪钟，只是听力严重衰退，纵使我喊破喉咙，依然无法跟他很好地沟通。我只能利用拿回的和搜集到的资料，以及我对他有限的感知，完成独属于我的人物专访。

感谢成君！

在军营中成长的笛子手、 指挥及音乐总监 郑顺发少校



文·郭永秀

图·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武装部队”这一名称，往往让人联想到刚强勇猛、保家卫国的形象，似乎跟文化或文艺攀不上关系。然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军队体系里，都设有制度化的文艺队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有这样的一支队伍吗？答案是肯定的。

记忆回到1992年，我曾出席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既有合唱、西洋弦乐，也有华乐，表演者正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属下的艺术团。而这个艺术团的领军人物就是郑顺发少校。

邻居笛子声触发他的音乐细胞

郑顺发出生于1956年。小时候家里装了丽的呼声收音机，丽的呼声除了播报新闻、广播剧、流行歌曲、文艺歌曲外，也经常播出各种地方戏曲，如京剧、越剧、粤剧、潮剧、黄梅戏、福建歌仔戏、海南戏等。此外丽的呼声也会播出许多好听的华乐，如《姑苏行》《欢乐歌》《钱塘江畔》《东海渔歌》《马鞍山序曲》等，还有许多电影的配乐。这些好听的音乐，深深吸引了他，也成为他最早的音乐启蒙。

有一天郑顺发听见隔壁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子声，原来是他的邻居在吹笛子。他听了很感兴趣，就买了一把笛子，开始自己学吹起来。那个年代没有专门教音乐的学校，特别是华乐，所以他就只能自己摸索。通过一些音乐的书如《笛



子吹奏法》，还有电视的节目，自己一步一步摸索，跟着学吹《欢乐歌》《姑苏行》等笛子曲。

小学的时候郑顺发就读于光华学校，老师知道他会吹笛子，就叫他在学校的聚会上上台表演，他记得当时在台上表演的曲子是《喜相逢》。后来老师还带他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录制音乐节目。中学时他进入中正中学分校，但是中正中学分校没有乐队，所以他也只能靠自学的方式继续吹笛子。

1979年，中国东方歌舞团到新加坡演出，带来了许多精彩的歌舞以及音乐节目，在本地乐坛引起不小反响。其中不少作品是由关迺忠编曲、作曲的，并由他亲自指挥。80年代，瞿春泉带领上海民族乐团来新，呈献了许多歌唱节目以及器乐演奏节目，使本地的歌唱与民乐（华乐当时称为民乐）等掀起了一股旋风。其中孔庆宝的笛子独奏《荫中鸟》《姑苏行》给郑顺发留下深刻印象。1994年，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到维多利亚音乐厅演奏，笛子演奏家李增光演奏了《绿洲》这首具有丰富半音运用与高难度技巧的笛子曲，让郑顺发听得如痴如醉。这一系列来自中国乐团和演奏家的演出，对郑顺发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此他更加用心地努力学习笛子演奏。

此外，当时本地一些传媒机构主办许多比赛，例如电视台主办的“斗歌竞艺”，在本地的乐坛掀起另一股音乐旋风。郑顺发虽然没有参

加这些节目，但是当这些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他可以从中观摩学习别人的演奏。在另一个节目“才华洋溢出新秀”中，郑顺发受邀带领一支小乐队，为唱歌的人伴奏，这些都让他吸收了丰富的演奏经验。

在电台华乐团中成长

1976年，郑顺发通过友人的介绍，进入当时的电台华乐团。电台华乐团隶属于新加坡广播电台，可以说人才济济。参加电台华乐团后，他的视野明显拓宽，也获得了更多展现才华的机会。他跟许多年龄相仿的朋友们在一起互相学习、切磋。在合奏之外，他也有许多独奏的机会，演奏技巧因此不断提升，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

当时电台华乐团的指挥是郑朝吉，经常安排郑顺发协助策划乐队每周的例常演出节目，并参与电台乐团广播节目的制作、安排录音等。这些工作使他不仅在演奏层面获得锻炼，也在音乐理解、节目编排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记得当时电视台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星·星·星》，这是一个以流行歌曲为主的节目，深受新加坡观众的欢迎。除了本地的歌手以外，也经常邀请许多外地如香港和台湾的歌星上节目。这个节目每个月至少一场，有流行歌曲和民歌演唱，郑顺发就负责乐队伴奏，为乐队编曲的是杨秀伟。



在电台华音乐会上独奏乐团

成立武装部队文工团艺术团

1974年郑顺发入伍，参加国民服役，接受军官的训练。9个月他毕业后，成为一名排长，后擢升为连长，在军部的人事管理部当主任，后来又擢升为营长副官，隶属于国防部一位高级军官麾下。有一次这位高级军官到中国访问，回来以后就问他，是不是懂得音乐？原来他在中国受邀观看文娱演出，演奏会中有一位笛子大师詹永明跟他提起：你们新加坡有一位郑顺发，笛子吹得很不错。

1990年，郑顺发接到当年武

装部队文工团团长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在文工团里成立一个艺术团，这个艺术团包括合唱、弦乐组以及华乐组。若有兴趣，他会向总部推荐，由郑顺发来负责。这是一个让他发挥才华的机会，却也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一切须从

零开始，而且是政府部门组织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其实设立这样的艺术团，是当时的副总理吴庆瑞的想法。因为他曾经到台湾访问，见到台湾军队里有这样的组织，觉得非常好。在军队里成立艺术团，可以缓和军队里枯燥的生活，严肃的氛围，让军士们有机会放松心情观赏艺术表演，调剂精神，也能够提升队友们的凝聚力以及对音乐文化的鉴赏力。文工团也可以外出表演，表现军人不止能够随时准备作战，那些具有艺术细胞的军人在艺术方面也一样能够发挥所长，显露他们个人的艺术天分，成为一个允文允武的军人。

武装部队艺术团于1991年底开始筹备，1992年5月正式成立，成为文工团属下的一个艺术团。空手起家不容易，郑顺发认真地拟定好招生计划，主要是征召那些入伍的新兵，在经过三个月的基本军训以后，若有兴趣，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直接参加艺术团中的任何一个单位。这个征召行动得到许多新入伍的国民服役新兵热烈的反应，像现在活跃于乐坛上的黄德励、倪恩辉、郑景文（后改名郑璟绅）、梁永顺、蔡友国、陈彦聪、王辰威、林毅，还有现任新加坡交响乐团（SSO）团员的Chan Yoong Han、Kong Xian Long、Foo Say Ming、Chan Wei Shing和Song Woon Teng等，都是那段时间加入艺术团的。

从此郑顺发正式接任武装部队文工团（SAF Music&Drama Company，包括舞蹈团、爵



1992年，武装部队文工团成立后首次公开音乐会

士乐团、戏剧组和艺术团）的音乐总监以及其属下艺术团的艺术总监（SAF Musical Group Director）之职，走上了他人生的巅峰。他负责的这个艺术团吸收了许多具有音乐艺术才华的年轻人，为军队中比较枯燥严肃的生活提供了柔性的人文艺术氛围。他也为艺术团积极寻找外部指导，比如他曾特别邀请来自菲律宾的音乐家 Babes Conde来指挥艺术团属下的合唱团。艺术团的曲目不只限于华文歌曲，也包括大量脍炙人口的西洋歌曲与各地民歌，包括菲律宾、台湾、印尼、中国、日本、意大利等不同地区的作品。

艺术团也把触须伸向民间

在郑顺发担任武装部队艺术团音乐总监期间，艺术团基本上每年都有大型公开演出。这类演出让团员们有机会面对不同的听众，把音乐带给更广大的人群，同时也让他们吸取演出经验。艺术团更把它的触须伸向民间，特别是与学校合作，在与教育部共同策划的AEP（Arts Education Program）的计划下，每年都到学校为在籍学生主办60多场演出。演出形式非常亲民，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在台下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学生围成一圈，他们就在中间演奏、讲解，这样方便与学生们直接交流，演奏者与学生们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下交流，这也引起学生们广泛的兴趣和热烈的反应，而这正是推广和发扬音乐艺术的最佳途径。郑顺发也跟其他的机构，比如新加坡艺术理事会（NAC）合作，策划了多场公开的演出。

在演奏方面，因为郑顺发这一代人没有太多学习的机会，都是靠自学成才。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跟其他音乐家学习，例如他就曾经跟阎惠昌学习指挥；笛子演奏方面开始是自学，后来更得到笛子大师陆春龄、俞逊发的指点，至此他在演奏上突飞猛进，渐入佳境。

郑顺发除了指挥华乐团演奏一般华乐以外，对民间音乐也有深入涉猎，比如地方戏曲黄梅戏、京剧、越剧、芗剧、广东粤剧、潮州戏等，这源于他小时候收听丽的呼声所受到的影响。除了指挥乐队伴奏以外，他也学习地方戏曲中的掌板和打击乐。

郑顺发经常跟地方戏曲团体合作，每年至少安排三场演出。比如在1994年他与戏曲学院前院长蔡曙鹏合作，呈献多场地方戏曲的演出；亦曾与81岁高龄的京剧名票友潘月红合作，担任伴奏及演奏京剧。此外，他曾指挥大型华乐交响乐及京剧交响乐，部分作品由当时上海作曲家所编配的。此外，他也曾与武装部队军乐团合作，演奏一些西洋乐曲和流行乐曲等。

被武装部队破格擢升为少校

由于他在音乐推广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此也被武装部队破格擢升为少校（Major）。以下的记录显示出郑顺发对本地音乐的贡献：

1991年开始，多次受邀担任全国华乐独奏

公开赛及全国青年节音乐比赛（华乐组）的评判。1992年9月间，受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演奏比赛”，获得了三等奖及江南丝竹发展奖。

1995年，受邀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深圳举办的“95深圳中国民族音乐会”及2005年由上海民族乐团举办的海内外“名家名曲笛子专场音乐会”，呈献笛子独奏节目。

1996年开始受邀为戏曲音乐伴奏、掌板以及指挥的工作，所参与的剧种包括京剧、越剧、黄梅戏以及潮剧。

2006年1月，担任在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的世界首部功夫音乐剧《黄飞鸿》现场乐团指挥。同年6月，受邀担任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举行的21世纪国际华乐节比赛评委，并指挥约300人的综合乐团演奏《长城谣》。同年，也受邀担任新加坡华乐团主办的国际华乐作品大赛评委，以及由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办的2006年全国华族器乐比赛评委。同年12月指挥武装部队华乐团及爱华乐团，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的大型音乐演唱会《红楼梦》联合伴奏。

2008年5月，以第一位海外客卿指挥身份指挥西安音乐学院百人东方民族交响乐团，呈献《华乐新韵》音乐会。

2011年开始多次受邀担任慈善音乐会音乐总监，这些机构包括中华医院、广惠肇留医院、新



指挥华乐团



2008年，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指挥《华乐新韵》东方民族交响乐团



2010年，在维多利亚剧院指挥越剧《汉文皇后》，左一为郑少校



2012年，为越剧折子戏伴奏

加坡红十字会等。2015年3月担任在新加坡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我们的新谣演唱会”全场指挥。2015年7月也受邀为新加坡笛子节音乐会客卿指挥，2016年9月指挥武装部队华乐团在滨海艺术中心举办的“艺满中秋”，呈献3场以黄梅调和越剧为主的音乐演唱会。2018年1月受邀为新加坡笛子协会举办的新年音乐会呈献独奏节目。

郑顺发曾经担任过的各个艺术机构的职位有：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团成员、新加坡华乐团艺术与市场发展委员会委员、南洋艺术学院华乐合奏音乐总监，及由教育部辅助活动处所成立的华乐教育委员会委员。他也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华乐器乐考级名誉顾问、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音乐总监（1992-2017）。目前他也是“鬻乐团”与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CI-NTU）合办的华乐器考级（CIMGE）顾问团的成员。

为年轻一代的音乐工作者树立典范

郑顺发和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一样，虽然早年新加坡没有音乐学院，他没有机会接受学院系统式的音乐教育，但凭着他天生对声音的敏感，对音乐的爱好，刻苦自学，永不放弃，只要有便会向别人学习，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但他却做到了。他认为在军队中搞音乐，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

军人受过严格的训练，有坚定的信念、良好的纪律，合奏时更容易取得一致，达到声音和谐的效果。

郑顺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平时碰到一些以前在他艺术团里的团员，大家都和以前一样，尊称他郑少校。有些人表示非常怀念当年那些在艺术团里的日子，很享受那段沉浸在音乐里的美好时光。这使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因为在他有生之年，能够为新加坡的乐坛培养出许多现今在乐坛上相当活跃，而且都很有成就的团员。

早期的新加坡被称为“文化沙漠”，那是因为建国初期，政府需首先着手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无法兼顾精神方面的生活。但由于有了一批自发的文化工作者，不屈不挠地在贫瘠的土壤上为文化建设而辛勤努力、无私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文化上百花齐放的局面。郑顺发少校凭着自强不息、努力不懈的精神，以他个人的魅力，成为新加坡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一位笛子演奏家，更是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艺术团的奠基者与音乐总监。凭借坚毅的精神与卓越的音乐才华，在“文化沙漠”的年代为新加坡音乐文化开疆拓土，为新加坡的乐坛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他的贡献不仅丰富了军队生活，更为年轻一代音乐工作者树立了典范。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从龙套到挑梁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与

符岂华的采访是在一个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的。傍晚时分，我们坐在史丹福艺术中心里的一间小咖啡馆——Cheerful Goat Café。咖啡馆并不喧闹，却时不时被他开朗豪放的笑声点亮。那笑声来得自然、爽朗，没有刻意的矜持，也不带任何防备，仿佛他并不是在接受一场采访，而只是与我分享他一路走来的片段记忆。谈话在轻松的节奏中展开，从生活到舞台，从旁观到投入，他始终语气平实，态度坦然。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感受到，这是一位容易亲近、也愿意敞开心扉的受访者——而这样的平易近人，恰恰让他的故事更值得被慢慢听完。

符岂华的戏曲之路

在陪伴中长大

符岂华198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北海，成长在一个小康而安稳的家庭。家中有一名哥哥和一名姐姐，他排行最小。父母对孩子向来没有过多要求，更看重的是让他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自由而踏实地长大。与其说是被期待推动，不如说是在陪伴中慢慢前行。

童年的记忆里，父母留给他们最多的，正是这种不张扬却始终在场的陪伴。当邻居家已装上有有线电视、晚间追看连续剧时，他们家的客厅却常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伏在桌前做功课，父母静静坐在一旁翻阅报纸。没有刻意的督促，也不急着催促进度，只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安静地做着该做的事。那样的夜晚平淡而寻常，却在不知不觉中，为他留下了一种关于家庭、关于安定，也关于父母对孩子信任的深层记忆。

他的父母并未受过高等教育，父亲只念到中学，母亲则读到小六。家中没有刻意营造艺术氛围，却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了一种对“好看”与“合适”的感受力。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对美感的最初认识是来自母亲。小时候上美术课，画画并不是随意应付的事。母亲会坐在一旁，教他如何上色、如何配搭；学校布置的作业，例如编草席这样的手工活，也是母亲一步步示范，耐心教他完成。那并非系统的艺术训练，而是一种生活中的引导，在反复的动手与观看中，慢慢培养起对线条、颜色与比例的感觉。

就连穿着打扮，也是在母亲的搭配中完成的。她会替他挑选衣服、配好颜色，让日常的穿戴看起来整齐而舒服。多年之后回望，他才意识到，那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其实在不知不觉中，为他奠定了一种对美的直觉——不是张扬的审美，而是源自生活、贴近日常的感受。

走向舞台的少年

他就读的小学规模不大，全校学生约两百人。每逢一年一度的演讲比赛或歌唱比赛，他总是被老师点名参与。在学生人数不多的校园里，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优势，老师便会鼓励学生走到前面去尝试。这样的机会来得自然，也并不显得特别。那时的他未必真正明白“表现”的意义，只是顺着安排走上台去，说完该说的话，唱完该唱的歌，再回到座位。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人前，让他逐渐熟悉那样的场合，也慢慢习惯被目光注视。回头看，这些看似寻常的经历，为他日后走上舞台打下了基础——不是刻意训练出来的自信，而是在反复出现的机会中，悄悄累积而成的一种从容。

升上北海钟灵中学后，符岂华开始更主动地参与校园生活。他加入华文学会，投入话剧演出、演唱比赛等各类活动，舞台不再只是偶尔被推上去的场合，而逐渐成为日常的一部分。中四那一年，他尤其受到老师的重视。在每两个星期一次的活动，老师多次让他负责主持工作，让他在一次次实践中训练口条，也锻炼在台上应对与掌控场面的能力。那样的信任，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长期参与中慢慢累积而成。课外，他

也活跃于校外的佛学会青年团，从普通会员一路参与与筹委会，学习如何筹备活动、分工合作、处理细节。这些经验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舞台并不只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个人表现，也包含了背后大量的组织与协调。此外，他还曾担任《星洲日报》的学生记者，在书写与采访中接触不同的人与事。多元而充实的校园生活，让他的视野逐渐展开，也为他后来面对不同场合、不同角色奠定了扎实而从容的基础。

升上大学后，他进入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PM）修读土木工程。大学期间，他对文学作品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工程课程之外，他常到隔壁学院旁听中文系的课，先后修过散文创作、现代小说研究等不同课系。那些课堂并不在正式学分之内，却为他提供了另一种节奏——与公式和结构并行的，是对语言、情感与叙事的细致体会。文学并未改变他对现实的选择。完成学业后，他并没有转向与文学相关的职业，而是在2011年毕业后，选择来到新加坡工作，投身土木工程设计领域。只是回头看，那段在大学里“越院”听课的经历，更像是在为后来的人生保留了一条隐约的支流：在专业与生活之外，始终为兴趣留下一块空间，也为他日后走近舞台与艺术，埋下了安静而持续的伏笔。





2022年京剧《扈家庄》（线上节目），符岂华（右）饰演王英，黄萍老师饰演扈三娘

在对戏中磨功

2014年，经朋友介绍，他加入新加坡平社——一个业余京剧团。初入剧团的他，从“跑龙套”做起。那一年，在京剧全本《武则天与谢瑶环》中，他饰演家丁与刽子手，戏份虽轻，却让他第一次真正站进京剧的舞台结构之中。对戏曲表演几乎没有概念的他，只能在一次次排练与演出中，慢慢摸索其中的分寸与节奏。

两年后，在平社京剧折子戏《杨八姐游春》中，他饰演刘文晋，角色分量渐重，不再只是穿梭其间的背景人物，而开始承担起人物性格与情节推动的责任。这样的变化并非骤然发生，而是在持续参与与反复练习中，自然累积而成。

在剧团里，他陆续结识了许多资深导演与老师，如张莉、黄萍等。在他们的提点与指导下，他对京剧的身段、唱念与整体结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其中，黄萍老师后来邀请他加入自己创办的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并亲自与他対戏。在一次次排练与演出中，两人搭档演出了不少一对一的折子戏，如《昭君出塞》《盗仙草》《小放牛》等。与老师正面交锋式的对戏，对他而言既是压力，也是磨练。人物的情绪起伏、身段配合与唱腔分寸，都必须在舞台上即时回应。

“那几年能和黄萍老师一对一对戏，我的基本功才慢慢长出来，尤其是《小放牛》和《盗仙草》这些比较吃力的戏。老师是手把手教的，一

个动作一个动作来，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改。现在回头看，我当时坚持下来，真的收获很多，对我往后不管参与什么剧种都有很大的帮助。”

转向琼剧的契机

在平社期间，符岂华也遇到了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前辈——彭业华。彭业华多次鼓励他尝试琼剧。一次闲谈中，这位海南籍前辈提到，新加坡的琼剧演员日渐减少，年轻一代更是凤毛麟角，急需新生力量加入。这番话并非郑重其事的劝说，却在他心中留下了回响。

那时，他尚未真正踏入琼剧的世界。直到疫情来临，舞台按下暂停键，所有现场演出几乎停摆。国家艺术理事会随后推出资助计划，鼓励传统戏曲团体将演出数码化、上传线上平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琼剧同好——彭业华与刘伟嘉——决定尝试申请资助。2020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新加坡华戏荟”。

有了基金的补助，他们开始排练并拍摄琼剧折子戏，陆续上传至YouTube平台。镜头前的演出，与剧场中的现场氛围截然不同。没有观众的即时回应，所有情绪与节奏都要在空旷的场地中完成。对他而言，那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一段重新摸索的过程。随着疫情逐渐缓和，剧场的大门重新开启，他们终于得以回到熟悉的舞台。当灯光再度亮起，观众的掌声与回响回到耳边时，那份久违的现场感，让他们意识到，琼剧并未远去。几场演出下来，观众反应出乎意料地热烈，也给予了他们继续走下去的信心。

在这样的持续排练与演出之中，符岂华逐渐在琼剧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得益于学习京剧所打下的基础，他在身段与舞台节奏上已有一定的把握。然而，随着一次次排练与登台，他渐渐发现，琼剧与他之间的距离既熟悉又陌生。虽祖籍海南，家中长辈日常以海南话交谈，但成

年后使用机会渐少，语感与发音也随之生疏。真正站上琼剧舞台，他才意识到，戏中的海南话与生活里的对话并不相同，音韵与节奏自有分寸。为了把戏唱好，他只能从最基础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向老前辈重新学习拼音与念白，反复校正发音与语调，同时苦练唱、念、做、打与手眼身法步，让语言与身体慢慢对齐。

从幕后到重角

在琼剧舞台上逐渐找到节奏之后，符岂华的参与也不再只局限于台前的唱念身段。2023年，彭业华在琼剧全本《张文秀》中担任主角，符岂华虽只演一个小角色，却更多投入幕后协助。从排练到统筹，他在舞台之外承担起不少工作。对他而言，这一年更像是一种“从整体看戏”的训练——不只完成自己的角色，也学习如何让一台戏顺利运转。

2024年12月15日，华戏荟于牛车水人民剧场上演《汉文皇后》，他饰演国舅窦广平，角色分量明显加重。窦广平既牵动朝局，也承载剧中的重要情感转折，尤其在最后一场“生祭”中，与汉文皇后的生死诀别戏份尤为沉重。面对这样层次复杂的角色，他坦言感到压力，也因此花了更多时间揣摩人物情绪，在唱腔与身段之间反复推敲。这样的历练，让他在琼剧舞台上承担起更实在的分量。

此后，他在琼剧舞台上的角色开始明显加重。仅在2025年，便接连参与三场重要演出。4月，他参演《白蛇传》折子戏专场，饰演许仙；7月，在新加坡首届“传统戏曲节”上，演出由张炎龙执导的新编《孔雀东南飞》。

对符岂华而言，《孔雀东南飞》的分量格外不同。他饰演焦仲卿，从排练之初，便意识到这并非一场可以凭经验应付的演出。焦仲卿的情感并不外放，更多是在沉默与犹疑中推进。人物的每一次迟疑与转折，都需要在唱腔与身段之间拿捏分寸。排练过程中，他不断修正细节，也反复思索人物内心的重量——那是一种比单纯技术更深的考验。

同年12月27日，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华戏荟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献全本经典

琼剧《红叶题诗》。这部被誉为琼剧“经典中的经典”的作品，成为团体年度排演的压轴之作。剧中，符岂华饰演文东和——一位才情与气节并重的书生。人物在爱情与权势之间的抉择，并非激烈的对抗，而是在分寸之间见定力。与焦仲卿的内敛压抑不同，文东和更强调气质的建立与风骨的呈现。在排练与演出过程中，他不再急于呈现情绪的强度，而是更在意人物是否自然、是否站得住。唱腔的收放、身段的节制，都需回到人物本身，而非刻意表现。

回看这几年的舞台历程，符岂华坦言，早期更多是在修正自己的不足。从发音、身段到节奏，他花了不少时间纠正习惯性的动作与表演方式，让每一个细节尽量贴近程式。近几年，他的思考已不再停留在“对”与“错”的层面。比起



2025年，在新加坡淡滨尼天地佳节艺术剧场演出琼剧《白蛇传》折子戏，符岂华（中）饰演许仙



2025年京剧《杨门女将》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符岂华饰演杨文广，黄萍老师饰演穆桂英



琼剧《汉文皇后》剧照，符岂华饰演窦广平，刘慧敏饰演窦姬



2025年，琼剧《红叶题诗》，符岂华饰演文东和

是否合乎程式，他更在意人物是否真实——如何让情绪自然流动，而不是刻意表现；如何让观众看到人物本身，而非演员在“演”。在技术逐渐稳固之后，他开始追求一种更松弛、也更贴近人物的表达。

一条慢慢走出来的路

即便近几年将重心放在琼剧排演上，符岂华并未与京剧舞台疏远。在黄萍老师的指导下，他仍持续参与京剧演出与对戏训练，先后参演《凤还巢》《杨门女将》等经典作品。不同剧种之间的身段、唱念与节奏，在实践中彼此映照，也让他的表演理解更加立体。

而这样的转变，也不仅发生在他个人身上。近几年，华戏荟在本地逐步累积观众与作品，也开始思考更远的方向。今年5月1日，华戏荟

受中国海南省琼剧院邀请，前往海口演出新编《孔雀东南飞》。这不仅是一场交流演出，也象征着本地业余戏曲团体在多年耕耘之后，逐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戏曲于他而言，并非一时兴起的爱好，也不是刻意追逐的舞台光环。它更像是一条慢慢走出来的路——从最初的龙套，到逐渐承担角色；从纠正发音与身段，到思考人物的真实与分寸。这条路或许不喧哗，也未必容易，却在一次次排练与演出中悄然延伸。对符岂华来说，未来未必需要宏大的设想，只需继续站上舞台，在唱念之间，把人物慢慢立住。

灯光亮起时，他所追求的，不过是让角色自然地“站住”。而这，或许已经足够。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当19岁的主编遇上160岁的公会



文·陈洁莹
图·受访者提供

凤廓汾阳公会芽笕会所的木桌上，躺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走近一看，是一本题为《凤廓汾阳公会一百六十周年文史纪略》的纪念特刊。书超过300页，封面虽朴实，却透着别出心裁的设计，大气而美观。

沉稳而有力——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作为公会有史以来第一本纪念特刊，它承载着公会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与文化。而它的诞生背后，藏着一段令人意想不到的创作过程——这本书的主编郭璟佚，在19岁那年完成了它。

160周年晚宴上新书发布

去年11月，凤廓汾阳公会举行了其160周年晚宴，庆祝公会作为新加坡宗亲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团体之一，迈过这一别具意义的里程碑。在晚宴上，同时发布了公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纪念特刊——《凤廓汾阳公会一百六十周年文史纪略》。公会会长郭绪泽与年仅19岁的主编郭璟佚手持新书，在台上合影留念，向在场来宾呈现公会第一本正式出版物的问世。

“这是一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活动。能够出席，我真的感到无比庆幸。”郭璟佚笑着说，“真的非常感谢三夫人，让我如愿以偿。”

晚宴的前几个月，璟佚便得知自己主编的书会在当晚的160周年庆典上正式发布。这本特刊，是他历时一年，倾注了无数日夜与心血而完成的作品，因此不论是对公会，或是对他个人而言，都意义重大。新书发布会也令他格外期待。

“我早早就向教官请了假，可惜当天已经安排好了军事训练，教官便回绝了我的请求。”得知自己无法参加晚宴、亲眼见证特刊的发布，璟佚一度十分沮丧。他解释道：“在服役期间，军训时间一般都是严格规定好的，不会轻易更改。”这个认知让璟佚心里更加明白，自己最终能参加晚宴的几率非常渺茫。

即便如此，在失落的心情下，璟佚内心深处仍抱有一丝希望。“那段时间，我时常在心里拜三夫人，请求她让我能够如愿赴宴。”而“三夫人”果然“显灵”了。

在临近晚宴的前一个月，他想要出席的心情愈发强烈，于是便怀着紧张的心情决定再尝试一

次。当他准备向教官最后一次发出准假请求时，却意外得到喜讯——军训时间有所调整，他的请假申请被批准！这突如其来的转机让璟佚喜出望外。

他后来回想，这一切似乎带着某种机缘巧合与呼应：晚宴当天恰逢“三夫人”诞辰，而他心中的请求，也在这样的时间点得到了回应。这段经历，让他印象尤为深刻。

加入公会的契机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至2024年7月的一天，那是璟佚第一次探访凤廓汾阳公会。之前，他因为公会独特的“三夫人”信仰而心生好奇，决定亲自前去探访了解。



郭璟佚手持主编的新书《凤廓汾阳公会一百六十周年文史纪略》（摄于2026年1月）

与郭会长和其他会员的交谈过程中，他意外发现了公会与自己家族之间的渊源——祖父因多年前曾乐捐善款给公会，竟成了这里的名誉会长。

这种突如其来的“连接”，让他在惊讶之余，也更多的是感叹于缘分的奇妙。最终，他决定加入公会，成为了最年轻的一名会员。

对于这样一个有热情、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的加入，会长郭绪泽以及众位理事都非常欣慰，也对他的贡献与付出表示肯定。

郭璟佚加入公会不久，便逢公会成立160周年。会长郭绪泽希望隆重庆祝公会跨过这一里程碑式的历史年份，却苦恼于该以何种形式进行。这时，璟佚提出了编写一本特刊的想法，与郭会长的想法不谋而合。

郭会长表示：“我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念头。公会成立了一百六十年，却一直没有一个系统记载公会历史的刊物。璟佚提出了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也很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项工作便落在了这个19岁年轻人的身上。



璟佚与父亲（左三）在曾祖父的祖厝和远亲合照



璟佚第一次到公会

特刊资料的搜集过程

接下了编写任务以后，璟佚开始全力投入，尽可能为特刊搜集更完整的资料。

在考完A水准考试、尚未入伍的那段时间，他频繁往返公会，到储藏室里翻找旧资料；入伍之后，他更是忙里抽闲，常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回到会所继续查找。那些被保存下来的旧文件与档案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也让他得以从不同角度理解公会的发展脉络。

在翻阅老照片、文件、记录与文物的过程中，璟佚对公会的认识逐渐加深。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与会员进行访谈——与其说是一次的正式访谈，不如说是一一次次自然的聊天。

因为经常到会所，他与会员们熟络了以后，也听到许多陪伴公会多年的老会员口中的故事。这些带有个人记忆的讲述就像是“口述历史”，为书中那些原本冷静的历史材料，增添了温度与细节。

2025年1月，璟佚第一次随家人来到祖籍地潮州潮安县探亲。在那里，他走访了大宗祠、祖厝与古庙等当地建筑，也结识了许多乡亲，并在他们口中听到了关于家族与祖辈的故事。

在庵埠镇郭陇村的凤廓古庙中，他再次见到了“三夫人”神像，正殿内亦供奉着三山国王。这一趟探亲，让他对自己的“根”产生了更具体而真实的感受。

特刊编写与制作过程

要在有限时间里梳理一个跨越百余年的公会的历史，这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是很繁重的任务，但璟佚却不这样看待。在面对我的感叹时，他却回答：“我不觉得辛苦，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在生活节奏单一且略显沉闷的军训生活中，编写特刊反而给了他一种“出口”，打发无聊。在日复一日的投入中有节奏地一步步推进进度、完成目标，这给了他莫大的成就感。

虽说怀着一腔热情，但毕竟在此之前，璟佚其实从未接触过类似的编撰工作，因此困难依然真实存在。一些如“一本纪念特刊应如何构成？怎么安排章节？”这些问题，都需要他自行摸索。

面对这些疑问，璟佚尝试过用对现代人来说最便捷的办法——“网搜”，但由于网上关于特刊的信息甚少，只能另觅他法。他不止一次前往

国家图书馆，借阅其他公会的纪念特刊，一些朋友也将他们收藏的特刊借予璟佚参考。他从这些特刊的结构与写法中学习和观察，再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框架。除此以外，为了优化内容，他也常与身边人讨论“应该增加什么内容”，积极征求反馈。

在查阅相关资料之时，他发现经常遇到不同来源之间相互矛盾且不一致的地方。璟佚表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我花更多时间去查证和对比，看看哪一个版本更接近事实。”这些仔细核实的过程往往成为特刊信息准确与否的重要一环，虽繁琐耗时，但璟佚却认为必不可少。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璟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在晚宴即将举行的一个月前，我原本找的设计师告诉我他还没开始动工排版。”这一度让璟佚十分焦急，也感觉压力山大。最终，在自己的一位朋友介绍下，他找到了另一位设计师。

由于一开始便经费有限，从资料整合到英文翻译，璟佚一个人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几乎参与了整个制作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后来，由于时间紧迫，就连设计沟通、版面调整都需要他的大量参与。

在他与几人团队的紧密协作下，书还是有惊无险地顺利出版了。

年轻人融入公会所面临的问题

在谈及年轻人与文化之间的距离时，璟佚也提到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经历。国民服役期间，他曾随团队到文莱进行训练。一次训练结束后，他对当地的清真寺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前往参观，但身边的队友却更倾向于前往购物中心。这种反差，让他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同样的好奇与认同？”这件事情也让他更清楚地看见本地存在着的“文化沙漠”现象。

像璟佚这样主动走进宗亲组织的年轻人，并不多见。新加坡宗亲组织长期面临青黄不接、年轻人缺席的问题，近年来更是如此。在平均年龄不断上升的宗乡组织里，如何吸引年轻一代加入，传承传统价值与文化，成了最迫切的问题。

在谈到是否能够融入公会时，璟佚坦言：“可以融入，但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他认为，这种难度并不只限于表面上的沟通差异，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如不同世代之间在表达方式、思考习



惯，以及对组织未来的想象上的距离。“这需要我们用非常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不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都不能固步自封。”他强调，只要愿意多秉持开放和好奇的心态去相互了解，很多隔阂是可以慢慢被跨越的。

在谈到如何吸引年轻人时，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是“多接触”。如果从小就有机会跟随长辈走进会馆，对环境熟悉以后，距离就会被自然地拉近，日后也会更愿意参与到会馆活动中。

另一点，则是“吸引”。他认为会馆本身拥有独特且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其实并不缺乏独特性，关键在于是否被看见与理解。璟佚以自己作为亲身例子，他最初正是因对“三夫人”这一相对罕见的信仰而产生兴趣，才想进一步了解公会，进而走进公会。这种带有文化深度的特别魅力，是让他产生兴趣的起点。

除此之外，璟佚也认为，会馆与年轻人之间若要产生联系，靠的一定是双方的努力与相互包容。“年轻人要愿意走进来，会馆也要愿意让他们参与。”他说，如果会馆能够给予更多尝试的空间，去培养年轻人，让他们真正有机会上手，参与到组织运作当中，而不只是停留在外围观察，这种经验将增加他们的信心与融入感，最终促使他们继续留下来。

不论是出版特刊，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加入，凤廓汾阳公会所展现的不仅是单个个体组织的故事，更让新加坡的宗乡会馆看见了传承与革新的希望。

在许多宗乡会馆共同面临的困境当中，这样的故事，也许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个案。但至少在那本厚重的纪念特刊里，璟佚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者为本刊编辑)



黄金月

黄婉彬

丁雯静

林玮婕



家后：闽南女性的力量

记第三届“闽南文化在新加坡”之“闽女讲坛”



文·林美幼
图·新加坡厦门公会

在新加坡这座多元文化交汇的城市里，闽南文化既是历史的记忆，也流动在现实的日常之中。它或许藏在庙宇的香火之间，或许停留在一声熟悉的方言里，也或许体现在一桌节庆饭菜的讲究之中。很多时候，人们谈及文化，往往着眼于制度与象征，却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延续传统的人。正是在这些不经意的日常实践中，文化的温度得以保存与传递，也让闽南文化在异乡生根发芽。

在闽南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女性始终是文化最坚韧、也最稳定的承载者。她们或许不在族谱最前页，却撑起了家庭的精神核心；她们或许不常出现在史书中，却在生活日常、节庆习俗与代际教育中，默默完成文化的传递。可以说，闽南文化能够走得远、留得住，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闽籍女性不张扬却稳固的中帼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之下，由新加坡厦门公会主办的第三届“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之“闽女讲坛”应运而生。2026年1月10日，400多名华社人士、学者与文化爱好者在新

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汇聚一堂，讲坛以女性叙事为切入点，通过主旨演讲、互动讨论和点评环节，从家庭、信仰与迁徙、身份认同等多个层面，重新审视闽南文化的传承路径，也让那些长期隐于日常之中的女性身影，被重新看见与理解。此次四位主讲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闽籍女性，她们以专业诠释文化，用生命经验讲述文化，让我们看见——闽南女性不仅是文化的继承者，更是文化的推动者。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局长章慧霓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新加坡华人社会中，闽籍华人占比最高，约四成华人以福建话为主要方言。早期移民多经厦门南来，在南洋落地生根。闽南文化因此成为本地华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局长回顾了先贤在教育、商业与社会建设方面的贡献，并特别提及多位闽南女性先驱在社群组织与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她强调，文化传承不仅依赖制度与建筑，更仰赖社区与家庭的长期实践，以及一代代在生活中默默付出的个人行动。

在物质文化层面，从天福宫到道南学校旧址，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空间，见证了闽南社群在新加坡的发展轨迹。然而，若缺少日常生活的延续，再宏伟的建筑也难以真正“活”起来。章局长还分享了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创新实践，包括传统茶庄的现代化演绎、老字号

薄饼的复刻与改良，以及戏曲和民俗活动的社区推广等。这说明，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关键在于人们愿意在生活中不断赋予它新的意义。由此可见，文化不仅存在于宏大的象征空间，更深深扎根于社区与家庭的实践之中。

来自厦门的黄婉彬副教授从岁时节气与民间习俗切入，指出闽南文化的根基在于生活本身。无论是正月初九“拜天公”的庄严仪式、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抑或七夕“七娘妈”对妇女与儿童的守护，这些信仰实践构成了闽南社会的精神结构。黄副教授强调，闽南文化的核心在于“感恩”与“饮水思源”，而仪式的存在，是将这种价值观转化为可被体验、可被记忆的生活方式。她进一步提到，节庆与礼俗不仅调动人们的感官体验，更在潜移默化中教会下一代对先辈与自然的尊重。

华人历史纪录片工作者丁雯静通过多个家族故事，呈现女性在民间信仰中的实际角色。无论为孩童“收惊”，抑或在家族重大时刻主持仪式，女性往往是传统实践的执行者与记忆的保存者。她指出，女性不仅维系家庭日常运作，更在情感层面承担整合与修复的功能。当家族面临裂变与流散时，常由母亲或长辈女性使家族重新凝聚。文化记忆因此不仅存在于文本与档案，更存在于代际之间的口传与实践。丁女士形象地比喻，女性是家族精神的“隐形胶水”，默默维系着家族的连贯与温度。

资深媒体人、现任凤凰网特约评论员林玮婕从迁徙与认同的角度，探讨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流动。她分析欧洲华人社会的发展脉络，指出第二代移民曾一度与传统疏离，但在全球格局变化与文化自信提升的背景下，新一代逐渐重新理解自身的文化根源。她认为，美食与日常生活经验，是文化记忆最具穿透力的载体。当年轻一代愿意亲手参与传统实践，文化便不再停留在象征层面，而成为可以被身体感知的经验。

对谈环节由大华继显证券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黄金月主持。讨论从理论延伸至现实经验，使讲坛更具生活温度。围绕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问题，丁雯静从“家族系统”角度强调支持的重要性；林玮婕分享以美食与运动调节生活节奏；黄婉彬则认为，对工作的热爱与家庭的理解，使多重角色得以协调。针对闽南女性“拼命”精神的提问，黄婉彬认为这是对勤勉的肯定，同时也强调生活品质的重要；丁雯静则指出，这种吃苦能力使女性成为家庭稳定的核心。



在教育议题上，黄婉彬提出应适度放手，让孩子在探索中成长。对于文化遗产的现实路径，与谈嘉宾亦提出多元看法。丁雯静强调学习闽南语的重要性；林玮婕认为语言与饮食是文化的“日常载体”；黄婉彬则指出，应善用新媒体传播传统，使文化在变化中延续。多元观点的交流，使讲坛呈现出更立体的文化图景。

新加坡厦门公会荣誉会务顾问、原政务部长曾士生作此次讲坛特邀点评。他以宏观视角总结新加坡华人移民发展的“四步曲”——请神、建会馆、办学、办华文报，揭示文化在异乡扎根的历史路径。他进一步指出，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家庭的“中间力量”，在代际之间传递情感与价值。

曾士生亦提到，新加坡长期以家庭为政策核心，例如组屋制度鼓励家庭单位的形成，体现出对社会稳定的重视。他呼吁民间社团继续推动文化遗产，同时鼓励新移民积极融入，在参与中建立新的文化认同。

透过本次“闽南讲坛”，我们得以重新理解文化遗产的方式。文化并不只是被保存的对象，而是在生活中被不断实践的过程。闽南女性或许不总处于历史的中心，却在家庭与社区之间，成为记忆的承载者与传统的延续者。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守望文化并非停留不前，而是在变化中保持方向。当文化融入日常，当记忆通过生活得以延续，传统便不再遥远，而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实。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之中，闽南文化得以在新加坡持续生长，展现出温润而坚韧的生命力。

题图说明：

与谈人黄金月（左一）与三位讲者：来自厦门的黄婉彬副教授（左二），华人历史纪录片工作者丁雯静（右二），资深媒体人、现任凤凰网特约评论员林玮婕（右一）对谈

（作者为新加坡厦门公会文教主任）



携手同行 推动华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黄循财总理与宗乡总会领袖午餐会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3月9日，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亲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与宗乡总会领导层共进午餐，探讨政府与宗乡总会在推广及保留新加坡华族文化与传统方面的合作。这也是黄总理第一次以赞助人的身份访问宗乡总会。

当天，黄总理与国家发展部长兼华社联络组主席徐芳达，以及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一同出席午宴，在宗乡总会大巴窑会所享用传统潮州粥，并在黄总理为纪念宗乡总会成立40周年而赠送的“同行绘新”匾额前合影留念。

黄总理在午宴中表示，宗乡会馆历来在传承华族文化、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世代代以来，宗乡会馆在传承我们的传统及加强华族社群内部的互助与归属感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加坡不断发展，会馆的工作依然重要。”

他指出，宗乡总会不仅在文化传承方面表现卓越，也在吸引年轻人参与社区事务、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他肯定了宗乡总会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向总会表达衷心的感谢。他强调，政府将继续与宗乡总会及各会馆紧密合作，携手同行，保留新加坡独特的华族文化。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午宴上代表总会，对黄总理及两位部长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指出，总理在宗乡总会40周年庆典晚宴上赠送的“同行绘新”匾额，不仅肯定了总会的长期贡献，也寄托了对宗乡组织在新时代继续创新发展的期许。蔡会长表示：“我们期待未来与



黄循财总理（左）与蔡其生会长（右）在席间交流



黄循财总理与宗乡总会领袖一起探讨推广和保留华族文化与传统



徐芳达部长（中）、梁振伟代部长（右）、蔡其生会长（左）一起交流

政府进一步合作，带领各会馆携手向前，在新格局中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社会角色，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黄总理在去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曾宣布，政府将协助会馆保持活力，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包括推出培训计划，栽培年轻的社团领袖。蔡其生会长也在会上介绍了相关进展，宗乡总会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办的“华社领袖班”推出后反响热烈，已经收到超过120份提名，目前正在进行首届学员遴选，名单将于4月确定。同时，宗乡总会还与新加坡社科大学合作开设了一系列培训课程，通过培训与分享，既提升会馆管理能力，也让年轻一代更深入了解宗乡组织的价值与发展空间，从而激励他们的参与热情，承担社会责任。

黄总理特别指出，宗乡总会在传承华族文化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推进转型与创新，与时俱进，这与新加坡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相契合。总理指出，政府将继续支持宗乡总会在文化推广、社区建设及青年培育等方面的工作，确保会馆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独特作用。

蔡其生会长表示，宗乡总会的转型与提升不仅体现在文化遗产方面，也体现在社区服务与青年培养方面。通过与政府及教育机构合作，宗乡总会积极推动年轻人参与宗乡事务，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黄总理对此表示肯定，并期待未来双方在文化、社会及青年发展领域开展更多合作项目，共同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持续发展。

题图说明：

黄循财总理与徐芳达部长、梁振伟代部长莅临宗乡总会，与总会领导层共进午餐。前排左起为宗乡总会秘书长吴绍均，国家发展部长兼华社联络组主席徐芳达，宗乡总会副会长钟声坚，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副会长曾建权，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宗乡总会财政梁善源；后排左起为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符诗专、文化委员会主任杨应群、青年委员会主任周兆呈、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黄保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常任秘书张静文，总理公署通讯司高级司长林玮琳，宗乡总会产业委员会主任尹崇明、社会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曾锦鸿、执行总秘书李秀丽

（作者为本刊总编辑）



诚信成就了

黄海庆的睿智人生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与

这两届以高票当选醉花林俱乐部总理的黄海庆先生相识，迄今已历四十三年。多少年来，虽常在潮社活动中与他擦肩而过，点头致意，然真正结缘，却是近十年间事。自他进入醉花林领导班子，那亲切的笑容与平和的话语，便几乎成了俱乐部主办或赞助各类讲座、比赛、展览会上不可或缺的风景。尤令人瞩目的是，他双目炯炯，步履稳健，上下楼梯之间，身姿笔挺，气度从容。终于，在一个约定的上午，我得以登门拜访，与他近距离交谈，聆听他的人生智慧。

黄先生引我入其办公室，但见玻璃柜中，陈列着四方馈赠的历史纪念品，琳琅满目，皆有来处。大桌上整洁有序，信件依序摆放，待处理之事一目了然。另一柜中，文件夹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他吩咐同事，到指定位置取来两张音乐会赠券交给我，物件置于何处，心中了然，职员很快就取来了。其精明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醉花林讲座与课程丰富多彩

自2022年黄海庆出任总理以来，醉花林俱乐部组织的文化活动，堪称多姿多彩。从书画展览、相声、讲演，到流行歌曲比赛、声乐、太极拳、潮剧课程，为不同年龄层的民众提供了丰富的培训机会。主办“潮州好声音”传统潮曲卡拉OK歌唱比赛，邀请广东潮剧院二团、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演出，高质量演出给民众带来高价值的审美体验。主办公益性讲座，如《凤凰卫视》杜平的“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李有楠博士的“一个新加坡人的太空探险之旅”、时任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的张志贤与新报业媒体华文传媒集团李慧玲社长的“炉边对话会：小国生存的挑战”、郑良勇博士的“老板的精气神”、张政臣副教授的“从ChatGPT到Deep Seek，跟我有关系”、秦铭汉的“从数字化到智能化转型”、莫燕婷董事长的“薪火相传：家族企业的传承”等等。内容涵盖甚广，既有国家大事，亦不乏提升对AI认知的前沿讲座。

先贤远见 基业长青

创立于1845年的醉花林俱乐部，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更是东南亚潮州人最早成立的一所享有盛誉的俱乐部。那年，祖籍广东潮安庵埠、出生于怡保的陈成宝，移居新加坡后，在姐夫余有进的提携下，事业蒸蒸日上。陈成宝长袖善舞，与陈旭年、余有进、黄金炎并称早期星洲潮籍四大富商。彼时潮商日众，众人皆渴盼有一处可互通商讯、联络情谊、聚首消闲之所。陈成宝遂倡建醉花林俱乐部，并捐出庆利路（190, Keng Lee Road）之地，作为会所基业。在二战前，担任醉花林俱乐部总理者如廖正兴、林义顺、杨缵文、陈振贤、李伟南，都曾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1879年陈成宝辞世后，陈永锡、王柘榴、吴合弟、陈亚两、余智章等十位先贤，各捐四百元，共筹得四千元，向陈家购下这片距市区不远、面积十二万平方尺的土地，作为醉花林永久会址。黄海庆忆述：“重要的是，先贤们立下章程，此地不得变卖、不得抵押。”若无当年这份远见卓识，便不会有今日之醉花林——历经沧海桑田，依旧巍然屹立于高楼林立、名宅云集的牛顿地铁站旁，尽占地理之胜。

2007年，陈喜南担任总理期间，启动了拆除旧楼、重建新会所的浩大工程。新会所占地室内面积约五千八百平方尺，为四层现代化建筑，恢弘大气，美轮美奂，功能多元，堪称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的理想殿堂。新会所建筑耗资六千万新币，于2011年落成。2019年，醉花林又进行扩建，翼楼于翌年落成，增加了5000平方英尺的面积。

阿爷俱乐部的变革

彼时黄海庆出任第二副总经理。在陈喜南总理的带领下，新会所启用后，昔日曾经被看成潮州富裕人士的“阿爷俱乐部”，如今增设不享有投票权的普通会员制，任何年满21周岁的潮籍人士都可申请加入。不论贫富、不分性别，只要拥有或管理合法企业、而且至少担任经理职务者，都可以申请加入醉花林俱乐部。这就是黄海庆所说的，“任何组织，要运营得好，一定要与时俱进”。如今普通会员已逾近三百五十多名。这一变革，广纳各界精英——国会议员、社会名流、媒体名人、文人学者荟萃一堂，社会网络日益深广。

回馈社会是醉花林历史的主轴

作为潮人社团的醉花林俱乐部不止是为潮商提供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的休闲场所，提倡潮人文化习俗，推动公益慈善的活动，亦贯穿在180年的历史道路上。早期的筹款救灾，捐资救国，到推动潮人教育事业，也有一段一段值得追溯的故事。

黄海庆把时针拨回到二十世纪初：“当时，不同方言族群的会馆，为了照顾有地缘关系的乡亲，纷纷出钱出力创办学校。1905年应和会馆创办应新学校；1906年茶阳（大埔）会馆办启发学校，宁阳会馆办宁阳学校，潮州社群也不落后，有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今中华总商会）创始人之一的蔡子庸，和陈云秋、廖正兴和杨缵文等二十人，发起捐款活动，成立了公立端蒙学堂。创校初期，由蔡子庸担任学校总理，陈云秋（生卒年不详）担任义务校长，因为学



潮剧名伶张怡凰（左）和林初发（右）多次在醉花林俱乐部演出



“潮客相声汇狮城”是醉花林俱乐部支持的活动之一

生多为潮籍人士的儿女，当时学校以潮州话授课。1940年，建立义安女校。到了1953年义安公司接管端蒙学堂，学校改名为端蒙学校，以华语授课。两年后，增办端蒙中学。八年后，义安公司建立义安学院。这些潮社潮团对新加坡教育的热忱付出，包括了醉花林俱乐部的领导人如李伟南、杨瓚文、连赢洲等人。”

从榜鹅杂货店到华社领导

在访问过程，黄海庆多次表达了他对先辈的敬意。我请他说说他怎么从榜鹅的杂货店到知名华社领导的故事。他说“年少遇贵人，要知恩图报，饮水思源。从在榜鹅卖蛋的日子，我就知道做事一定要诚实守信，内诚于心，外诚与人，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础，更是做人应有的基本道德品质。一个人的品德比财富更为重要！”父亲在榜鹅八条石的巴刹开粮食杂货小店，在住家边养鸡养鸭，卖家禽饲料。八个兄弟姐妹，都是店里勤勉的好帮手。“母亲常告我们：要赚钱就要勤劳，讲诚信，不可以骗人。讲承诺，答应的事要落实。也提醒我们天晴要积落雨粮，赚有要助困苦人。”母亲的话，影响了黄海庆一生。

人生道路上，机缘神秘而奥妙。在中正念书

的时候，他热衷于摄影，因为摄影可以捕捉真实场景、美景。七十年代初黄海庆肄业于南洋大学经济系期间，他曾担任南洋大学摄影学会会长，策划与主办了第九届国际学生摄影沙龙，展览会由当时的文化部易润堂部长主持开幕，为他的摄影梦，留下美好的一页。

不久后，机缘巧合之下，他遇到了曾长期担任醉花林第一副总理的方燕山（1965-1983）。同是普宁人的方燕山邀请黄海庆加入他创办的亚洲摩哆，从当执行员做起，勤快热忱的他，仅仅三个月便升任助理营业主任。后因表现出色，很快调任门市部，销售汽车。他身上就有那个时代南大生打拼的精神特质和意志本色，双语优势，让他熟读政府经常修改的车税条例，敏锐追踪市场走势，掌握汽车买卖细节，很得方燕山器重。

以诚信创业 夫妻同甘共苦步新程

在打拼日子中，黄海庆积累了商机分析能力，精准把握市场动向。水到渠成时，黄海庆和友人于1975年合资创立了丽都摩哆贷款（Leco Motor Credit）。“起步时，夫妻档的小公司员工不到五人。太太林丽虹英文好，处理财务和文书，我负责营销。”夫唱妇随，一主内、一主外，十分勤快的太太是他成功事业的坚强后盾。创业第二年，政府实行鼓励旧车换新车，提早报销可获得特别回扣，刺激了旧车出口行业，黄海庆于是转而做起旧车出口生意，出口到峇淡。和蔼诚实的黄海庆很快赢得当地人的信任，最好的年头，一年卖出的旧车竟有500辆之多。后来，他遇到亚洲摩哆一位叫Simon的市场经理，他来自锡兰。依靠他的人脉，旧车出口到锡兰。不久后成为丽都首个海外的大市场。

不料开始于1997年7月初的亚洲金融危机大火，从泰国发端，迅速燃烧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此后韩国、日本、中国香港都受到冲击和影响。印尼盾大贬值，黄海庆的公司顿然被一间进口商拖欠了60多万元。处境虽艰难，他也没有对一时欠巨款的商家发怒。他泰然说道：“留得友情在，不怕没钱赚”。

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种素质。黄海庆善于应变，出口旧车难以为继时，他果断寻找新商机，入口日本新车，很快抢占了入口汽车市场。之后，又成功聚资开发服装生产与贸易，成为意大利著名体育品牌卡帕（Kappa）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及尼泊尔的总代理。



黄海庆、林丽虹贤伉俪，夫唱妇随

回馈社会 醉花林推动文化活动

今年八十岁的黄海庆，多年前已把业务交给长子黄永腾打理。如今他专注与董事们一道，将醉花林打造成高水平社会公益和文化活动场所，成为世界潮人的联络中心。许多在这里开展文化活动的艺术家、导师和推动者，都异口同声感谢黄海庆的热忱支持。

书法家曾广纬说：“这几年，在黄海庆总理支持下，醉花林为书画家提供了展示空间，在推动我国书画艺术方面可说居功至大。例如狮城书法篆刻会每年的重要展览如世界书法艺术大展、常年书法展、挥春展等都和醉花林俱乐部联办。其资助的文化活动门类多，可以说已经是一个设备齐全的文化堡垒，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醉花林华语讲演会现任会长翁慧贞也深有感触：“在黄总理支持下，讲演会有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场地。2025年——新加坡建国六十周年、醉花林俱乐部一百八十周年、国际演讲会成立一百周年——三大庆典之际的‘亚太地区冠中冠幽默演讲邀请赛’，海外来宾对场地赞誉有加。好场地吸引有才能的参与者，参与者众多，对主办者是一种动力，活动越办越好。”

创立于2018年的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也是受惠团体之一。创团音乐总监兼指挥郭永秀回忆：“没有场地的草创时期，我们到处流浪，苦不堪言。直到2020年获得黄海庆总理支持，提供了一个符合全频段频率响应、低噪声、具有吸音地毯和天花板，能减少回声的优质排练厅，在创团团团长陈之权博士和乐团经理韩进元的共同努力下，有了飞跃发展。2024年乐团又邀请二胡演奏家黄文财担任指挥。指导员有郑重贤、吴友元、巫振加和组织潮乐小组的陈有才。每有节庆，乐团主动演奏助兴。在醉花林支持下，乐团阵容已扩大至七十人，年龄从九岁到九十岁，涵盖老、中、青、幼四代乐手。”

文化传承：让年轻人兴致勃勃

有前瞻性理念的黄海庆，让不同追求的文化团体有了崭新的展现机会。他说：“文化的延续，要融入时代语境。吸引年轻人兴致勃勃地参与，才能达到传承与延续的目的。”

当端蒙校友会严文忠告诉他，校友会想主办新加坡首届分设中学组、高中组、大学组及公



黄海庆与醉花林领导和来访的汕头文化艺术学校艺术团合影

开组的潮州电影短片比赛时，黄海庆马上回应道：“这种轻松有趣的竞赛形式，一定会让更多年轻人接触潮语、认识潮语。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承传统，会有效果。”得到醉花林俱乐部赞助的端蒙校友会讲座，既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题目，例如会计咨询集团RSM石林合伙人林理明和刘慧玲的“2025年新加坡财政预算分享会：如何让自己从中受惠”，以及自由文史工作者李国樑的“黑道江湖：中国天地会诞生的新加坡私会党”等，都是座无虚席。

健康才能快乐 快乐才能做事

这次访谈，让我深深感受到黄海庆的宽广视野、海量胸怀、超群格局，更从细节，感受到他的敏锐反应。去年汕头文化艺术团其中一场演出中，演员用力过猛，一件小道具掉到台下了。他火速从贵宾座位上起来，快速上前拾起来，轻放回台角落。演员松了一口气，戏得以演下去。

年届八十的黄海庆，思路敏捷，充满智慧、我很想知道他健康的秘诀。他笑了：“身体健康很重要，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要乐观，少发脾气，生活有规律，不熬夜，不宵夜，早睡早起。每天起来我要练练腿，让脚踝有力，脚掌内外旋、上下勾放。腰板要直，我每天手执棍放在肩膀背后，天天练就驼背。有空就唱唱歌、散散步，跟朋友吃吃饭、谈谈心，活得开开心心。”他顿了顿，又笑着说：“不是说开卷有益吗？开心也有益呀！”

这句话，像他的人一样——朴实，真诚，却透着岁月沉淀的睿智。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鼓浪屿姑娘的新加坡人生

林文庆夫人殷碧霞



文图·陈煜

林文庆医生（1869-1957）可以说是马来亚历史上最杰出的华人之一，堪称旷世奇才，晚年被誉为“新加坡与厦门的元老”（the Grand Old Man of Singapore and Amoy），无论是以何种语言书写的马来亚华人传略，都少不了关于他的那一篇。能够成为林文庆夫人的女性也非等闲之辈，都是精通华英双语的基督徒：第一位夫人黄端琼，是诗巫小福州开创者黄乃裳的长女，两人于1896年结婚，育有四子，不幸的是她于1905年12月21日病逝；第二位夫人殷碧霞（1884-1972），则

是好友兼合作伙伴殷雪村医生的幺妹，于1908年结婚，育有一女一子。

殷碧霞1884年7月1日出生于鼓浪屿，1908年婚后从厦门迁至新加坡，常年往返于两地，直到1937年林文庆辞去厦门大学校长之职，才开始定居于新加坡。尽管穿梭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殷碧霞在二战爆发之前已是新加坡华人妇女界的领袖，她1972年8月20日逝世于新加坡，与林文庆同葬于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本文通过回溯这位鼓浪屿姑娘的一生，审视20世纪初新加坡与福建之间的人员与文化交流，揭示当时福建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新加坡华人女性的成长。

祖籍江苏的鼓浪屿殷家

1950年沈渭泽编纂出版的《新嘉坡华侨名人传》，以中英双语介绍本地闻人，林文庆是继陈嘉庚之后的第二位人物，殷碧霞是少有的女性人物之一。值得关注的是，该书中对于同一人物介绍的中英版本内容略有不同，有关殷碧霞的中文版收录其家世背景，推测是由她本人所提供，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厦门近代史与福建基督教史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殷碧霞的陈述，其家族原籍江苏省常州县黄沙巷，父亲殷荣康于1847年前往厦门，受洗成为基督徒，开始传教生涯，为西方传教士教授中文长达50年。28岁时，殷荣康与吴淑懿结



林文庆、殷碧霞结婚瓷相
（图源：Roots）

婚，两人育有四子三女：长子雪桥、次子雪圃、三子雪村、四子雪帆、五女清霞、六女绿霞、七女碧霞。殷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殷碧霞称其母是中国最早的基督徒之一，其父于1901年创办厦门港堂会，义务服务20多年，父母身后同葬于该堂界内。笔者在厦门调研时获悉，殷荣康在厦门曾创办厦港锻造厂和荣康小学。

殷荣康与夫人提倡男女平等，子女均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样开明的家庭环境在当时是罕见的。他们亦积极推动废除地方传统陋习，尤其是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例如女子裹脚、买卖婢女等。殷碧霞与娘家的感情深厚，即便是远嫁新加坡，她仍在厦门鼓浪屿购地置业，还不断返回厦门探望家人。晚年时她曾回忆，在真正定居新加坡前，她往返两地至少有28次。林文庆52岁时接受陈嘉庚之邀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殷碧霞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人物，因为她渴望回到故乡。

福建教会学校双语教育

殷家虽非大富大贵的人家，却有着广泛的基督教会网络，为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华英双语教育。大哥殷雪桥于1894年来到新加坡任教于东方学校，后在漳州创办中西学校，1913年在新加坡去世。三哥殷雪村1877年生于鼓浪屿，9岁进入厦门福音堂义学，11岁在泉州教会义学肄业，14岁始学医于厦门同昌药房，后进入福州仓山鹤龄英华书院就读，20岁到新加坡担任闽语传译员，得到闽籍先辈的资助前往美国、加拿大与英国学医，后返回新加坡行医，1920年受封为太平局绅。

殷碧霞则是8岁时进入鼓浪屿怀仁女学，14岁前往漳州就读于大哥创办的中西学校，成为最早进入男校就读的女生，16岁时前往福州进入美以美教会的英文女学。1904年毕业时，因成绩优良而留校任教，1906年返回厦门担任厦门女子高等学校英文教师，成为闽南女子执教鞭之第一人。

根据殷碧霞的回忆，她是1907年第一次南来新加坡，在三哥家住了不到两个月，得以结



林文庆、殷碧霞与子女（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识林文庆并订婚，随后返回厦门。1908年4月4日，殷碧霞与林文庆在鼓浪屿英国领事馆注册结婚，举办了当时福建首创的新式婚礼。5月初，殷碧霞在母亲的陪伴下跟随林文庆来到新加坡，这位年仅24岁的鼓浪屿姑娘，很快展开作为林文庆夫人的社交生活，陪同丈夫出席海峡殖民地的庆典活动。1910年9月，她第一次陪同林文庆前往北京，开始与中国政府达官贵人的交游。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是以英语还是华语，殷碧霞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为自己赢得了名声。

20世纪初的鼓浪屿，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教育水平，都令殷碧霞深感自豪。婚后第二年，她以林文庆夫人的名义在*The Straits Chinese Annual*（《海峡华人年刊》）发表题为*Kulangsu*（《鼓浪屿》）的英文文章，热诚地介绍她的生长之地，以“百闻不如一见”的华人谚语邀请读

者到鼓浪屿一游。她的两个孩子都曾在鼓浪屿接受教育：女儿林月卿就读于毓德女中，前往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是获得该院歌唱比赛奖章的第一位华人；儿子林炳汉1902年出生于鼓浪屿，1929年在新加坡英华书院通过剑桥高级考试，前往英国学习汽车工程，成为马来亚著名的赛车手，并经营汽车修理公司。

穿梭新加坡与中国之间

从厦门南来新加坡，殷碧霞体会到社会、文化与习俗上存在的差异，但很快融入本地生活。她回忆初抵时最为震惊的是榴莲季节的气味与遍地果壳。婚后执掌家务时，她的惊喜是洋房外的开敞空地，没有像中国那样高高的围墙，她感慨本地没有盗匪，可能是因为食物充足与低廉的生活成本。在她眼中，家中雇佣的司机、厨师、阿妈与男仆都非常好，且薪水相当的低。新婚的殷碧霞也第一次见识海峡华人的不同习俗。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二天晚上，林文庆带她去拜访一位阿姨，虽然她有些紧张，但这位长辈似乎很喜欢她，听说他们夫妻二人是乘坐人力车前来，便毫不留情地训斥林文庆。第二天，林文庆就为她准备了专用马车，她因此第一次接触马来语，为了与驾车的马来人沟通，出门时总带着一本马

来语字典。

林文庆被称作是中国和英国双重效忠的典范，是两国政府渴求的专业人才，殷碧霞跟随丈夫出席国际活动，游历世界各地，增长了见识。例如，1911年3月，林文庆作为清政府代表出席在巴黎和罗马召开的国际医学会议，随后前往德国德雷斯登参加万国卫生博览会。6月则作为海峡殖民地的代表，以贵宾待遇前往伦敦出席英皇乔治五世加冕大典。民国成立之后，林文庆于1912年前往中国担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兼医官，次年升任卫生部总监督，殷碧霞得以结识宋庆龄、宋美龄姊妹。

笔者对于林殷二人在鼓浪屿的地契研究显示，林文庆与殷碧霞结婚后频繁进出中国，除了为国事奔忙、任职满清和民国政府之外，也因家事频频造访厦门，在鼓浪屿购地置业，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笔架山东南麓的宅基地（今笔山路5号），从1909年开始展开长达13年的购地建宅工程，兴建了可以远眺山海壮观景色的宅邸，是他们一家在厦门期间的住所。殷碧霞称她曾在厦门老炮台附近购置一块土地，捐献给了厦门大学。

殷碧霞曾经在福建执掌教鞭，林文庆在新加坡是华族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的倡导者，她成



修复前的笔山路5号林文庆殷碧霞宅邸（图源：笔者自摄）



修复后的笔山路5号林文庆殷碧霞宅邸（图源：笔者自摄）

为新加坡女子学校与中华女校的坚定支持者，二战后担任俊源学校与国专学校董事等职。殷碧霞的社会活动主要围绕着扶助弱势群体，包括孤寡老人、孤儿与婢女，她以林文庆夫人的身份在厦门与新加坡两地倡办养老院、孤儿院、保良所等。1913年在厦门倡办养老院收养孤寡老人，成立保良所解救婢女，1930年复任厦门养老院院长与保良所所长。1938年创办新加坡华人孤儿院，被推举为首任院长。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殷碧霞与林文庆再度倡办孤儿院，获得胡文虎的支持，由她担任首任院长。

出生于中国的殷碧霞被称为“Daughter of China”（中国的女儿），成长为新加坡华人妇女界领袖。1927年山东济南惨案后，新加坡华社成立筹赈会，殷碧霞担任妇女部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担任南侨筹赈会妇女部主任。另一方面，她与受教育的海峡华人女性交往甚密，1915年与李浚源夫人等23位受过教育的华人女性成立了Chinese Ladies Association (Singapore)（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1938年再度被推选为该协会会长。殷碧霞对于慈善事业的贡献，亦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认可，1915年获委任为保良局董事，1938年被委任为监狱视察员与青年犯罪法庭顾问，是本地首位担任此职的华人妇女，1948年受英皇乔治六世封为太平局绅。

结语

鼓浪屿在1902年成为公共租界前，已是在厦门的洋人聚居之地，设有教堂与教会学校，能提供优质的华英双语教育，殷家兄妹得益于此。殷碧霞兄妹南来新加坡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显示19世纪末厦门的基督教网络与福建教会学校的水平，他们因为基督教家庭背景与父母的开明态度，在福建各地的教会学校接受高品质的教育，能够了解西方文明，具备相当的英文能力。

厦门是福建人南洋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当地掌握华英双语的优秀年轻人，得以南来从事专业工作，与海峡华人知识分子一起推动本地教育与



1950年代的林文庆与殷碧霞（图源：BiblioAsia）



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内林文庆与殷碧霞墓（图源：Wikimedia）

社会改革。由于两位兄长在新加坡的经历，特别是三哥殷雪村定居本地，殷碧霞成为林文庆适合的婚姻伴侣，婚后她频繁往来两地维持活跃的社交生活。鼓浪屿对于她而言，不仅是出生成长之地，也是堪比新加坡的理想生活之地。

殷家的家庭教育对于殷碧霞有着积极影响，林文庆作为海峡华人社会改革家，推动女性教育与解放，殷碧霞婚后得以施展个人抱负与志向，以林文庆夫人的身份活跃于厦门与新加坡。尽管时人对殷碧霞的为人褒贬不一，有人赞她是直言不讳的巾帼英雄，有人则称其个性强悍，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家庭背景与故土情感，亦影响着林文庆这位海峡之子的社会与个人生活。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华中颐年日日新 读书会的守护人 陈兴庭



文图·王英弘

这是一篇在兴庭学长往生后被我下意识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动笔的文章。兴庭学长生前曾叫我写一篇关于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的文章投稿到《源》，也给了我《源》编辑部的联系方式。无奈我因忙于工作和其他事务，在他生前一直没动笔，总感觉来日方长。但无常来袭得太突然，兴庭学长无预警的骤然逝世让我更感难于动笔，只因往事并不如烟，和兴庭学长生前的交流和互动在我脑海里都还历历在目，我知道一提笔叙述往事必会让我伤感不已，故一直不敢提笔。无论如何，我也深知我不能让他遗愿未了，于是在某个星期日的午后，我特地抽空并找了个幽静的地方开始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俩，既是悼念他，也向读者介绍他生前念兹在兹的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

从日日新读书会 到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语出自《礼记·大学》，记载商代开国之君成汤在沐浴盘上铭刻，寓意自强不息，精神和操守不断弃旧革新，止于至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的华初学长冯国才和数位友人携手创立了“日日新读书会”，几年后读书会加入了华中校友会的例常活动。读书会早期以阅读人文书籍为主，立足中华传统文化，探索人文精神，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回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的挑战。2006年至2015年间，阅读的书籍就包括：《包容的智慧》《生活美学》《人能弘道——论语》《新文化苦旅》《原来孟子这样说》《遇见未知的自己》《当中国统治世界》《心经》《六祖坛经》等等，涵盖儒释道各家经典。华中校友会日日新读书会是一个阅读与实践并重的学习平台，倡导学以致用，提升会员的人文修养和内涵。



陈兴庭生前照片

在冯国才学长的积极推动下，日日新读书会不断成长壮大。他也通过吸纳不同教育和专业背景的会员，使读书会的导读内容拓展至人文以外的更多领域。日日新读书会自2013年起，成了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世界书香日”的常客。期间，读书会多次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导读会，和公众分享阅读心得，并开展交流学习。导读书目涵盖广泛，包括《从0到1》《曾国藩家书》《创新者的窘境》《人工智能》《鼠疫》《谢谢你迟到》《大贬值》等等。随着时间推移，日日新读书会导读所涵盖的领域已明显地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进入第二阶段发展期的日日新读书会，虽累积了十多年的导读经验，但须以全新的姿态出现，推陈出新。我们急需一位资深的守护人，在各个方面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就在这时，兴庭学长通过陈华明学长（本身也是读书会的成员）的口中获悉读书会的状况，他对我们的理念深感认同，时任华中颐年俱乐部主席的他便邀请我们加入华中颐年俱乐部，在华明学长领导的文教组下运作。

由于读书会本就由华初学长创立，让读书会在同属华中大家庭一员的华中颐年俱乐部旗下运作也是很自然的一事，所以读书会本身并没异议。就这样，读书会成员在和兴庭学长吃过一次晚饭后，日日新读书会便成为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了。

2023年6月，日日新读书会正式加入华中颐年俱乐部，并易名为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而之所以加入华中颐年俱乐部，一大因素便是我们也不想帮助较年长的、习惯用中文交流的国人了解新兴科技和财经知识，以便更从容的面对高度科技化的未来所带来的挑战。同年我们也正式推出了我们的宣言：

日日新读书会宣言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语出自《礼记·大学》，记载商代开国之君成汤在沐浴上刻铭，寓意自强不息，精神和操守不断弃旧革新，止于至善。

本着同样的精神，“日日新”读书会希望以



独特的方式，用上述名言来激励本地华语社区。此外，我们也希望通过积极的互动和参与，向那些希望提高自己中文水平的人伸出援手。

读书会因此以阅读中文书籍为主，立足中华传统文化，探索人文和科学精神，共同学习和成长，回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的挑战。

我们定期开展广泛的书籍分享会，涵盖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金融和经济、世界政治和社会科学、新兴科技（如区块链、AR/VR/MR、大数据、AI、网络安全、量子计算）等。

我们致力于帮助目标受众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总体了解，同时帮助他们保持对金融和经济、世界政治和社会科学、新兴科技等领域的最新发展的认识，这对一个人保持与时代同步至关重要。

秉持读书会一贯的理念与良好的导读成果，我们于2023年底正式向国家图书馆提交申请，寻求支持，以便让我们更有效地推行导读并让公众人士获益。

非常幸运的是，国家图书馆认可了我们的理念，让我们自2024年开始每年可免费在国家图书馆总馆进行四次公开导读；图书馆也免费安排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的员工给导读团队提供一个几近完美的导读环境。再加上一年一度的“世界书香日”导读，读书会每年会在国家图书馆总馆亮相五次。此外，我们也在华中颐年俱乐部和其他合作方的场地进行不同形式和性质的、较随机性的导读，课题包括了保健、养生、旅游等等。

在2023至2025这三年内，在兴庭学长的守护下，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一共举办了将近20

场的读书会，书目包括《大贬值》《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濒死与生命重建》《道德经和AI时代》《AI时代的现金战争》《成为AI时代的赢家》《意义创新》《佛学和量子力学》《区块链很简单》《笑看风云行善路——“不忘初心”篇》《百年量子·缔造霸权》《元宇宙》等等，涵盖范围极广。

对读书会的念兹在兹

认识兴庭学长不过短短三年左右。三年，在一般的朋友交往中，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对于我来说，他除了是一名学长，更像是一名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自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时间或许有“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之分，之所以觉得认识兴庭学长已久当然是心理时间上的认知了。

细想，这并不难理解。由于读书会诸多活动，每场导读会从策划、筹备到正式推出，再加上导读会前后的聚餐，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集。这诸多的交集，可能是在一般情况下要好多年才能累积而成，所以就制造了一种错觉，让我感觉认识兴庭学长已有多年。

他可能比我还更关心读书会的一切，常主动和我们讨论如何把导读会搞得更出色，让出席者获益更多。他也是读书会的最佳代言人，常在他的朋友圈和隶属的其他团体里推介我们的读书会。他若在国内，必会出席每一场导读会，并在会后给予我们非常中肯的反馈和鼓励。

每次导读会前后的聚餐，由于担心我们吃得

不饱和不好，他都会鼓励我们尽管点自己喜欢的菜，由他买单。而他在餐桌上那句现已成绝响的“我们不差钱”，也成了我们吃得尽兴的底气。

他对读书会的鼎力支持也体现在为读书会采购书本方面。兴庭学长常出国，近至邻国的新山，远至中港台。每次出游，他都不忘特地到当地的书店去看一看，针对我们要导读的课题给我们采购最新出版的书本。

有一次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他的视频来电。他兴致勃勃地说他正在台北的诚品书店，看到了很多关于AI的新书，还特地把手机的摄像头拉到书本前让我过目，以便决定该买哪些书。

还有一次，我俩都在国外，在互传简讯时我随意提到可能要导读王阳明的著作。怎知就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他就发来了他刚在上海某书店买的王阳明著作的封面，附带一句“快吧？”其实我们在互传简讯时他并不在书店，他是过后特地去找书店买书的。我当时真的是受宠若惊，心里也充满感动。

更有一次，一起用晚餐时，我不经意地提到了可以考虑导读文学类的书目，而我不久前在纪伊国书屋看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会去买一本。他立马说他让他的外甥女去向纪伊国书屋订购。晚餐后回到家不久，他便发来了《百年孤独》不同版本的封面照片，让我挑一本。

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尽录。很多时候，我随意或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书目，他都认真以



兴庭学长（左二）和导读团队及获奖观众摄于《百年量子·缔造霸权》导读会后（2025年9月27日）。恰逢2025年是联合国的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读书会特地准备了奖品给现场正确回答问题的观众



兴庭学长（右二）和读书会成员参加国家图书馆的活动（2025年10月4日）



兴庭学长（左二）与读书会成员聚餐



导读圆满举行后的庆功宴，右五为兴庭学长

待。现在他已不在人世，回想起来尤其让人难过。

他总是会通过不同的途径，自掏腰包给我们买书。他常在出国旅行时带回诸多书本，这也让我动容。我虽自诩为爱书人，出国旅游时也尽量少买书，只因书本太多会很重又占据空间，难于携带。

他对读书会的爱护是毋庸置疑的。就在他逝世前的一两个月，他以读书会的名义在一宗乡团体的特刊上登广告，还特地交代我写一篇介绍读书会的文章投稿到《源》。他当时神情自若，外表也无异样，我以为可以稍等，因有其他俗务缠身，不料竟成一憾事。

学长生前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次见兴庭学长，是在去年10月13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40周年庆典晚宴上。他当时订了一桌，邀请我出席。席间，他谈笑风生，把我介绍给之前没见过面的他的朋友认识，顺便提及我们的读书会。当然，他没忘了提醒我要记得写一篇介绍读书会的文章投稿到《源》。

我满口答应下来，心想，等我月底出国开完会后，一定把文章写好，毕竟拖欠已久。

每次一起用餐后，如果他也是要直接回家的话，总会主动说要送我回家。他总会说反正他开车，又顺路，举手之劳而已。但我心里很是明白，他总归是要多绕些路才能送我回到家的。而在送我回家的路上，他一般会和我分享他的一些往事和生活中的一些趣事，或是给我介绍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和手机应用。有一次，他非得让我在车还在行驶当中当场下载一手机应用，说是非常有用，让它听任何歌曲的一小段，即能告知歌名。这对日后要找回偶尔听到喜欢的，但又忘记或不知道歌名的歌曲，大有帮助。当下，他就是

个童心未泯的长者，急于和朋友分享他觉得有意思的东西。他非常有诚意，让人觉得很亲切。

不巧，当天的晚宴结束后，另一华中学长率先说要送我回家。我不想拂他的好意，兴庭学长想必也不会介意，便搭了这位学长的顺风车回家了。

我万万没料到这是我在兴庭学长生前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不是终点，是另一起点

我最后一次和兴庭学长互传简讯是在去年10月底我在国外开完会后回到新加坡的当天晚上。我给他发了一些我在会场拍摄的照片，他回了几个大拇指和鼓掌的符号。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当晚较迟时分身体突感不适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一两天后就过世了。由于他一直在急诊室，住院期间除了直系家属，朋友们都不能去探病。

终于完成了这篇拖欠已久的文章。让我不胜唏嘘的是，本是一篇介绍读书会的文章，现在也变成了一篇悼念兴庭学长的文章。

我个人心里觉得较安慰的是，兴庭学长在参与读书会的活动时应该是快乐的。从他不吝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积极、深度地参与读书会的活动，大力并慷慨地给予我们各方面的支持，每次和我们聚餐时都兴高采烈，等等，可见一斑。

我们会铭记兴庭学长对读书会的守护和支持。他的骤然离世虽让我们一时难于适从，但我们会秉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让读书会茁壮成长，以不辜负他对我们的深厚期望。

（作者为华中颐年日日新读书会会长）

新加坡先贤

慈善家颜永成



文图·何乃强

我 阅读过好些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先贤的故事，他们为新加坡的社会福利、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教育卫生等各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这些人都获得政府的推荐，封赐勋衔如英国皇室各种级别的勋章，以及地方政府颁赐太平绅士JP荣誉，作为他们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奖励和肯定，或者将一条街道以该人的名字命名，让有功者及其家人后代深感祖辈的荣光，使得家族名声显赫并激励后人为延续这份荣耀而更加努力。

然而，在众多获颁崇高荣誉的先贤中，我特别注意到当时的新加坡名人颜永成（Gan Eng Seng, 1844-1899）似乎并未获得类似的表彰，他既没有勋章勋衔，也没有以他命名的道路，但是他所作出的贡献巨大，功绩不容忽视，新加坡人以“慈善家”誉称他。

在公共卫生方面，1867年新加坡的广府籍先贤创办了同济医社，该院最初位于毕麒麟街上段（又称单边街）31号的排屋店铺。1892年医社迁入位于哇燕街（现余东旋街）的宫院式建筑，并改名为“同济医院”，颜永成是同济医院地契上的四位信托人之一。同年，颜永成也把被解散私会党义兴公司总堂位于梧槽的一块永久地契的地皮捐赠给陈笃生医院，捐赠记录在该医院1892年的医院常年报告书里。同济医院在1976年迁到现今的振瑞路50号同济大厦，迄今继续为病黎服务。

颜永成在支持教育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由于他觉得自己从小家贫，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深感教育的重要，他立志待他发迹后，要为贫困儿童创办一所学校，提供以福建话为教学媒介的华文



颜永成

（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和英文学校。他于1885年在位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排屋店铺创办了只收男生的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直到1923年，即38年后，该校才更名为“颜永成学校”，以永久纪念创办人。1997年，颜永成学校的原址，被新加坡政府列为国家保留建筑。

颜永成学校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殖民地时代的学校，除了政府创办外，很多是由教会或宗乡团体出资兴办，而颜永成学校则由一名新加坡居民独资创办。1889年，政府在直落亚逸街拨给学校一块土地用于新校舍的建设，校舍的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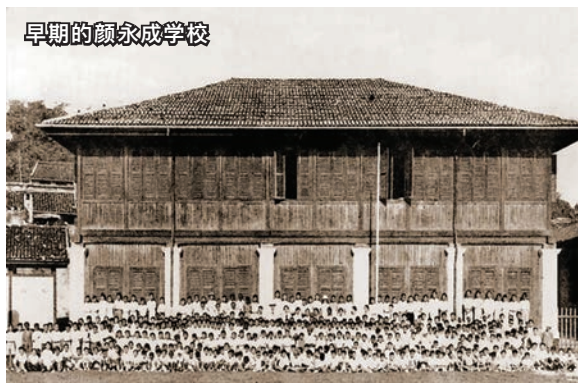
由颜永成亲自出资完成。颜永成在世时，学校教授中英文，他去世后学校改为纯英文教学，并设立信托委员会。由于资金短缺，学校开始收取学费。1937年，因财政困难，信托委员会无法对学校进行重要且紧急的维修。为了学校的利益，颜永成学校于1938年转为政府学校。

除了在新加坡兴学，颜永成亦在其祖籍地福建及马六甲创办义学，并赞助年轻学子深造。此外，他于1895年，联同林义顺、陈若锦、林文庆等人创办了商界团体“怡和轩俱乐部”。

颜永成是中国福建移民的后代、马六甲土生土长的峇峇，只接受过小学程度的教育，学习书写简单中英文。他是家中五个孩子的老大，16岁时父亲去世。此后，他开始经营豆蔻等土产生意，做些小本生意谋生。

他的人生转折点始于成为英国人出资创办的牙直利公司（Guthrie and Company，当地人称土库）的学徒，并在此结识了贵人汤玛士·史各特（Thomas Scott），史各特时任公司开发丹戎巴葛区以及新加坡海港项目的负责人，也是公司的合伙人（1857-1867）。这位洋上司赏识颜永成的勤奋努力和工作能力，擢升他为公司仓库助理，接着更上一层楼成为总管。颜永成的职位扶摇直上，最终在1874年当上公司总买办（Chief Comprador），任期长达25年。这位洋贵人还协助颜永成进一步发展事业，让他为丹戎巴葛公司供应劳工（包工头）及运输代理人，颜永成从此发家致富，进而购屋置地投资建砖厂等。

颜永成在1899年因拇指被生锈铁器刺伤，引发血中毒去世。据推测，其伤口可能导致梭菌（Clostridium）感染，进而引发破伤风（tetanus）致命。在当时，预防破伤风疫苗尚未问世，



相关的类毒素（toxoid）和球蛋白也未出现，一旦感染，死亡率很高。他终年55岁，身后留下五位妻子、七个儿子、五个女儿及四个孙子。

值得一提的是颜永成和一位非华族的阿鲁苏医生Dr. Max Simon Aroozoo（1850-1931）的交谊，阿鲁苏医生是一名欧亚籍的慈善家，为新加坡的教育以及医药保健亦作出很大的贡献，殖民地政府曾将两条道路，以他的姓及名Aroozoo和Simon来命名。他在牙直利公司任职57年，鉴于阿鲁苏医生同样在牙直利公司任职长达57年，两人极可能因同事关系而结识，两家人亦结为好友。颜永成去世后，是阿鲁苏医生协助处理颜永成的遗产，更被传为佳话的是阿鲁苏医生的男孙Percival Frank Aroozoo（1900-1969），后来在颜永成学校担任校长长达17年（1938-1955），一时成为美谈。

颜永成的一生，是很多远赴他乡，移民新加坡华侨的缩影。这些华侨，来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辛勤劳作，成家立业。稍有所成，就不忘在当地建设家园、建医院、办教育，照顾侨居当地的同胞，出钱出力。同时也不忘家乡的亲人，赈济祖国受难的同胞。相信“李广难封”，不是颜永成所愿，功成不居的他，彰显出他高尚的人格。

（作者为本地知名医生兼作家）

喃呒师傅“诤真堂” 与胡家三代记



文图·庾潍诚

人生三大事，莫过于生、死与婚。自古以来，养其生、慎其终、择其偶，关乎人伦和礼制。传统笃信道（佛教）的华人在办理丧白事过程中，多聘请法师道士（俗称“喃呒师傅”）协助操办法事以渡化告慰亡者。在旧时代的新加坡，众多喃呒师傅之间也曾经组织过一个行业团体——“诤真堂”。与做法事相配套的，则有制作“纸扎”（用于祭祀和丧俗活动的纸人纸马、摇钱树、金山银山、牌坊、门楼、宅院、家禽等各种焚烧纸品）的行业团体——“云锦堂”。

近年我整理旧时广帮“碧山亭”的总坟照片档案时，经手和印象深刻的是“诤真堂、云锦行大总坟”（第四亭），它的立碑时间是清光绪廿七年（公元1901）。根据照片，该墓墓联上写“诤真道法源流广，云锦礼作世代昌”。1980年左右，碧山亭原有324英亩（相当于131公顷或183个足球场）的坟场清山后，转变为“碧山”市镇和住宅用途。清山后，像“诤真堂”“云锦行”这众多总坟的故事，似乎从此戛然而止和画上句号了。但其实不然。

近日，我幸运从一位喃呒师傅的遗孀夏女士手中，征集到了一张已经传承三代人、超过60年历史的“诤真堂”黑白老照片。可以说，“喃呒师傅”这一冷门行业以及行业团体“诤真堂”的历史，非常罕见。此类行业组织通常口耳相传，文献稀缺。因此，我们能搜集到存世照片做为论述佐证，自有一番意义。

夏女士捐赠的这张老照片，是一众喃呒师傅在丁酉年（即公元1957）“庆祝先师宝诞”后大合影。夏女士在口述采访时透露：喃呒师傅行业团体“诤真堂”原位置在豆腐街（在今唐城坊一带，俗称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reet），大概在1969-1970年间拆除。从此“诤真堂”解散并走入历史。

今天，我们有幸重新目睹和审视这张黑白老照片，是饶有趣味和意义的。

第一个意义，这张黑白老照片呈现了旧时新加坡从事喃呒行业的真实面



一众“喃呒”师傅庆祝道教老祖宝诞后合影，照片摄于丁酉年（1957年）。胡氏家族从中国南来新加坡，祖孙三代皆从事“喃呒”行业。照中有第二代传人胡耀明（前排左二）、第三代传人胡炎强（后排左一，当时只有12岁）

貌，让我们在今天得以管窥昔时“诤真堂”的历史遗影。配合碧山亭库藏的“诤真堂、云锦行大总坟”照片，根据立碑在清光绪廿七年（公元1901）的时间点来看，可知“诤真堂”的悠久历史。随着豆腐街拆除，“诤真堂”也不复存在，因而这张照片更见证了“诤真堂”的历史轨迹。

第二个意义，这张照片不仅传承了三代人之手，而且背后还隐藏胡氏家族三代从事“喃呒”行业的真实故事。夏女士告诉我，她的夫家“太公”（喃呒伟？一？）是中国南来新加坡的第一代喃呒师傅，此后二传胡耀明（1915-1971），再三传胡炎强（喃呒强，1945-1990），迄今四传年轻一代才转改其它行业。可以说，“喃呒”是一种从古至今都属于“小众”的冷门行业，平时敲敲打打让人敬而远之，但一旦需要操办白事时却又成了每个家庭的“必需品”。从中国南来的胡氏家族至少连续传承三代人做喃呒，此前其家族衣钵传承的历史很可能会更早。这种家族事业文化传承和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敬佩。

顺带一提，“喃呒强”的佚事。从小在豆腐街隔邻松柏街长大的黄义强（前吉宝船厂机械部经理）告诉我：他自小与豆腐街“多寿”寿板店老板颇熟（也是三水会馆理事之一），他常到“多寿”玩，所以时常看到“喃呒强”做法事。他还是小学五、六年级生时，22岁的“喃呒强”在豆腐街一带已经是名声响亮的喃呒师傅，人人皆晓。他非常佩服“喃呒强”年纪轻轻就能够把一本《超荐仪轨》唸诵得滚瓜烂熟，据说是每



旧时碧山亭第四亭的“诤真堂、云锦行大总坟”照片。立碑于清光绪廿七年（公元1901）（图源：广惠肇碧山亭）

天背诵的缘故。另外，黄先生的先父当时在三水会馆教舞狮，因而和“喃呒强”交往颇多。黄先生还回忆说，喃呒强虽然身材微胖，但“破地狱”（一种斋醮科仪法事）的功夫了得，动作灵活，唸经的音色柔和。

第三个意义，是传递有关民俗文化的知识。这张黑白老照片志期：“岁次丁酉年结月拾六日”，是一众喃呒师傅庆祝“先师宝诞”（指道祖老子先师诞辰）后合影。丁酉即公元1957，但何谓“结月”，则令人难解。为解开这个疑惑，我遍查各种史料可惜均不得其解。此后某天，我再请教胡氏家族的喃呒传承人陆荣新师傅，才知晓原因。原来，喃呒师傅推崇道祖太上老君（即老子）等“三清”尊神。民间关于“太上老君”的诞辰有四说，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五，农历十二月十六，农历七月初一，农历十二月初六。据陆师傅说，喃呒师傅于每年四次庆祝“太上老君”诞辰后，都有联欢叙旧宴席，尤以农历十二月初六这天的庆祝为重。这是因为此时已濒临一年之结尾，于是将农历十二月称作“结月”（有总结、尾芽之意）。所以，这张黑白老照片署“结月拾六日”也就是农历十二月十六日。

曾活跃于豆腐街一带的“诤真堂”，如今早已消失在城市发展的尘烟之中。那些在黑白照片中神情庄重、衣袍整肃的一众喃呒师傅，大多也已归于黄土。然而这张摄于1957年的老照片，犹如一扇时光之窗，让我们得以管窥那个时代的信仰秩序与职业尊严。这张老照片不仅承载着一个行业的历史记忆，也昭示着家族技艺与民俗文化的代代相传。在城市化迅疾前行的今天，这样的影像与记述，或许正是我们抵抗遗忘、寻根追本的重要凭据。



夏女士夫家胡氏家族在新加坡，从太公、家翁、到夫家，连续三代家传从事“喃呒”工作（左一是作者）

（作者为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副主任）

碧山亭万缘胜会



文图·蔡志祥

20世纪早期，由中国华南地区传入新加坡的“万缘胜会”，是一项由华人社区举行的宗教仪式，旨在超荐逝者、救赎亡魂，主要由广惠肇碧山亭倡建并主办。

2023年10月重阳节前，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举办了一场三日四夜的“万缘胜会”。万缘胜会是华人社区超荐逝者、救赎亡魂的仪式，性质与中元节有相近之处，却并非如中元节一样每年举行。

1922年的农历七月，碧山亭举办了七昼连宵的“万人缘胜会”。^[1]这是新加坡华人首次倡建的万缘胜会，也是东南亚华人举办同类仪式的第一次。此后的100年间，碧山亭不定期地共举办了15届的万缘胜会（见表一）。除了1922、1964和1976年外，万缘胜会都是三日四夜的仪式。除了由僧人、道士和尼姑（比丘尼）诵经外，自2017年起，碧山亭也邀请客家籍的斋姑，执行仪式。^[2]

表一：碧山亭举办的救赎仪式年份与间隔

举办年份	间隔	举办年份	间隔	举办年份	间隔
1922*	0	1974#	3	1998	11
1943	21	1976*	2	2003	5
1946	3	1978#	2	2007	4
1952	6	1980	2	2012	5
1958	6	1982#	2	2017	5
1964*	6	1985	3	2023	6
1971#	7	1987#	2		

*举办日数为七日八夜，其余的皆为三日四夜
#为小规模的一日二夜的“超度幽魂”仪式

万缘胜会是要通过救赎仪式，让客死异地的祖先不至于沦为无人祭祀的游魂野鬼。在仪式中的“主荐”龙牌（编按：主要祭祀的神主牌位），包括了（1）广惠肇三属的集体祖先（如广州府历代宗亲先贤牌位祖先神位等）；（2）各属会的集体祖先（如南顺会馆历代先贤之神位）；以及（3）和普世救赎有关的牌位（如“十方世界受食孤魂由子等众”、“本区各家有主无依男女老少”、“海陆空三军阵亡烈士忠魂位”等）。数量占多数的“附荐”牌位，供奉的是有后人照顾的祖先。

孝道实践与宗教慈善

万缘胜会强调的是孝道和宗教慈善。大抵，这些“主荐”和“附荐”的对象可以理解为有后人照顾的“祖先”、有团体照顾的“先人”，以及通过仪式执行人的法力救赎的无祀孤魂。前二者是孝道的实践，后者是普世救赎的宗教慈善。仪式执行人为这些有主的、无主的“祖先”“先人”“孤魂”诵经忏悔，通过道士的破地狱的仪式，把他们从炼狱救出，再由僧人的引导，渡过仙桥，登上佛船，往生极乐。一系列的仪式也包括为生者祈福及转运。^[3]

在碧山亭第一个关于万缘胜会的碑记中，强调万人缘是“纪念”而非迷信的仪式。其目的在于要“神安鬼乐……神人共庆……各界绅商、善男信女、大舍金钱、造无量之功德……结万人

之缘、集千祥之福。”^[4]通过拟人的、模拟的、动感的仪式，实践孝道和宗教慈善。碑记指出“民国肇典以来，纪念二字，播于全国。观乎武汉兴师北讨，挽回中原，国有纪念。志士成仁救国，以争汉族之光荣，有纪念。家有祀奉祖先或尊尚敬如在，此明证家之纪念。清明重阳二节，绅商、各界妇孺，车马络绎于途，争先恐后，驰赴碧山亭者，何只万人，费继许金钱。此个人之纪念。”因此，万缘胜会强调的是国家容许的纪念活动。祭祀是秉承儒家的忠孝思想，而非对幽冥世界的迷信。执行仪式者，包括虚云法师（1840-1959）等正统的佛教高僧。从仪式的内容而言，万缘胜会与中元祭幽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救赎的主要对象（主荐），是与地域社区无关的幽冥世界。^[5]地方社会，无论是乡村或医院等慈善团体所超度的对象，如个人或家庭的祖先、医院的病死者等，皆是以附荐形式得到超度。

这种强调纪念的制度化宗教活动，是清末民初中国华南地方为对应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国家的反迷信运动，及纪念国家烈士的政策而发展出来的。从广州的医院、善堂，和寺观的筹款和功德活动开始，一方面很快为邻近乡镇所学习及采用，并以新的语言、形式和祭祀对象，包装华人传统民间宗教活动。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祭祀幽魂的形式，通过各种方法，为海外华人社团所模仿。东南亚广肇帮华人社会的万缘胜会的仪式，一直采用与珠江三角洲的万缘胜会相似的形式，以僧、道、尼同时执行仪式，并有主荐和附荐的祭祀对象。

1990年代以后，碧山亭的领导，积极推动碧山亭成为本地华人敬宗追源，以及弘扬华族文化的中心。因此，把万缘胜会从非常规性的仪式活动，改为五年一届的常规活动，从而得到固定的收入来源，作为推动碧山亭作为仁孝的儒家文



2023年，佛教僧人的经忏佛事



2017年，斋姑“破莲池”仪式



2017年，道士“破地狱”仪式

化的基地。^[6]

总而言之，新加坡广惠肇三属人士举办的万缘胜会，从模仿珠江三角洲城乡社会，为对应反迷信思潮发展出来的强调纪念的救赎仪式，发展到当代强调华人文化以及以孝道为中心的跨文化、跨民族的仪式活动的过程中，让我们认识到华人文化的跨国传播以及在地变容。

注释：

- [1] 〈万人缘胜会志闻〉，《总汇新报》，1922年9月1日。
- [2] 斋姑，指的是一群持长斋、带发修行的女性。斋姑所居住的寺庙庵堂，普遍被称为“斋堂”。关于斋姑的研究，参见苏芸若，〈狮城善女人——19世纪以来的新加坡斋姑社群〉，《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5期（2020），页121-182。
- [3] 关于万缘会的仪式，参考蔡志祥〈灵魂信仰、仪式行为与社群建构：以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会馆为例〉，页93-108。
- [4] 《（1923）碧山亭万人缘纪念碑》，原碑藏碧山亭福德祠内。又见丁荷生、许源泰编，《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下册（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808-809。
- [5] 各地万缘会的主荐牌位的写法稍有差异，一般包括：（1）各地水火风灾机船车祸罹难众魂灵、（2）世界各地海陆空三军阵亡将士众灵位、（3）列姓宗亲故友众灵位、（4）失祀众灵位等、（5）各性各名男女老幼、（6）十方法界水陆孤魂等。参考蔡志祥〈灵魂信仰、仪式行为与社群建构〉。
- [6] 施义开，〈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慎终追远，源远流长〉，《扬》，第16期（2008），页5。

延伸阅读：

- [1] 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碧山亭历史与文物》。新加坡：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2019。
- [2] 蔡志祥，〈灵魂信仰、仪式行为与社群建构：以马来西亚檳榔屿的广东暨汀州会馆为例〉。收入江明修、丘昌泰主编，《客家族群与文化再现》，页93-108。台北：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
- [3] 蔡志祥，〈从反迷信到万缘会：广州到东南亚的城市救赎仪式〉。收入李孝悌、陈学然编，《海客瀛洲：传统中国沿海城市与近代东亚海上世界》，页30-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4] 蔡志祥，〈生死两惘然：战后新、马华人对死难者的悼念与忘却〉。《比较中国研究》第3卷，第2期（2022）：页51-83。
- [5] Choi, Chi-cheung. "Ancestors are watching: Ritual and Governance at Peck San Theng, a Chinese Afterlife Care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Religions 11, no. 8 (2022): 1-13.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Peck San Theng's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

In the lunar seventh month of 1922,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held a seven-day-and-night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 the first ceremonial event of its kind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n until 2023, Peck San Theng had held 15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s irregularly. Apart from engaging Buddhist monks, Taoist priests and nuns (bhikkhunis) to recite scriptures, Hakka zhaigu (vegetarian nuns) have also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the rituals since 2017.

This ceremony seeks to prevent ancestors who died in foreign lands from becoming wandering spirits. The objects of these rites can be broadly understood as ancestors honoured by their descendants, forebears taken care of by associations, and unattended wandering spirits redeemed through the spiritual power of the ritual experts, showcasing the importance of both filial piety and religious charity.

During the ceremony, ritual experts recite sutras and perform penance for these “ancestors”, “forefathers” and “wandering spirits”, who are then rescued from purgatory through the Taoist “Breaking the gates of Hell” ritual, before being guided by Buddhist monks to cross the celestial bridge, embark on the ark of salvation, and attain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The ceremony also includes rituals that bring blessings and good fortune to the living.

The earliest inscription on the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 at Peck San Theng emphasises that it was a “commemorative” rather than superstitious ceremony. Its purpose was to ensure that “the spirits are at peace, 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gentry, merchants and devotees would donate generously to accumulate boundless merit, forge friendships and bring blessings to many”.

After the 1990s, leaders of Peck San Theng promoted it as a centre for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o honour their ancestral roots and pay respects to their forefathers. For this reason, it changed the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 from an irregular event to a regular one held once every five years, promoting Peck San Theng's status as a bas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centred on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The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 held by the Guangzhou, Huizhou and Zhaoqing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has evolved from one that emulated the commemorative redemption ritual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a cross-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ceremony that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lial piety, offering insights into the trans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local adaptation.

狮城古琴展

慕古雅逸韵



文图 · 润佳

高山流水觅知音，阳春白雪映清心。古琴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乐器，泠泠琴声流淌着遗世独立、闲云野鹤的逸韵……

相对于古琴的高标逸韵，在宴饮歌舞中常见的琵琶、古筝更能活跃气氛，贴近大众的审美情趣，也是从古至今华乐队主要的弹拨乐器。

如何让小众冷门的古琴艺术吸引忙碌的现代人？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的《听琴说：音乐、工艺传统与文人精神》展览，汇集了从汉代至今的近百件古琴、书画、典籍、青铜器、陶瓷等文物，可谓相当用心，氛围感十足。

步入二楼展厅，恍若穿越时空来到清雅的古代书房。备受瞩目的是玻璃罩中竖立的5张古琴：被专家考证为北宋理学家邵康节的仲尼式古琴，明代斫琴大师李苍梧所斫的神晖式古琴“月隐”，明代虞山琴派创始人严天池亲斫的仲尼式古琴“阳和”，明代的仲尼式古琴“秋声”，清代的蕉叶式古琴“凝晖钟睿”。这些传世精品保存完好，音色清润，弥足珍贵。

对面墙上悬挂一排的古琴是湖北斫琴大师宁群晖的心血之作。“听松”“希夷”“灵机”“元音”“飞瀑”……这些蕴含古琴音韵之美的名字，就让人好想聆听……观众扫描每个古琴右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欣赏到新加坡古琴艺术家纪志群演奏的琴曲；也可通过展厅的平板电脑点播视频《渔樵问答》《秋江夜泊》等古琴名曲，全都是纪老师亲录的。

古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地位崇高，四善（苍、松、脆、滑）九德（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是顶级古琴材质音色的鉴赏标准。常见的样式有伏羲式、神农式、师旷式、子期式、仲

尼式、连珠式、落霞式和蕉叶式等。唐琴被视为稀世之宝，从琴面弧度和形状比较，“唐圆宋扁”体现了唐宋不同时代的审美差异。

展厅一角有古琴制作的工艺流程影像，从良木甄选、琴体成型到髹漆成器，不仅工艺繁复，而且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时间沉淀。宁群晖讲，他按古法斫琴，一张琴的制作周期至少需要五年之久。珍珠粉、云母、朱砂、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玉石和孔雀石这八种材料，用生漆调出来的“八宝灰胎”，不仅可确保古琴持久耐磨，而且能够保持良好的传音效果。

主办方还特别为观众们提供了互动装置，



专家考证，此为北宋理学家邵康节（邵雍）的仲尼式古琴



明代的仲尼式古琴“秋声”



青花瓷盘上，抱琴侍童随着寻访知音的主人前行



剔红圆盒上的“携琴访友”

以电脑屏幕上的教学软件，引导访者轻松愉快地试弹。

与古琴主题相关的文物分列两侧，阐述着古琴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传说伏羲、神农氏都与古琴的起源有关，“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

“琴，禁也。”古琴是禁淫邪的雅乐。儒家的中正平和、道家的大音希声、佛家的空灵慈悯，都融合在古琴清幽淡远的音乐中……古琴有着通天地而合神明、教化天下、修身养性的功能，初始用于礼乐祭祀，后来逐渐成为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之首。晨起舞剑，踏雪寻梅，吟诗挥毫，“调素琴，阅金经”，高士隐者诗意地栖居，三五知己，烹泉煮茗，以琴会友，余音袅袅……

从东汉弹琴的陶俑到清代画中抱琴望月的佳人，展览呈现了人琴合一的雅趣和生活方式。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咏怀诗》字幅，是本地书法家吴德先写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剔红砚屏《曲水流觞》醒目鲜活，那种逍遥山水、诗酒唱和的风雅，不仅在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也体现在明代绘制的《西园雅集图》中。携琴访友的题材，除了扇形画，还有青花瓷盘和剔红圆盒的表现，相映成趣。

宋朝是文人黄金时代，也是古琴发展的高峰时期。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都是弹琴高手，宋徽宗设立“万琴堂”，收集南北名琴上百张，这位艺术家皇帝御制的古琴“松石间意”，于2010年以1.3664亿元拍卖，成为当时最贵的乐器之一。宋徽宗赵佶松下抚琴的情景永久定格在

他的佳作《听琴图》中，展厅的半面墙复制放大了这幅名画。

明清时期，古琴的流派纷呈，各具异彩。王公贵族不乏雅好者，清末皇族溥忻（字雪斋，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就是琴书画俱佳的高手，玻璃展柜内悬挂的“雪斋居士溥忻”的画轴，渔樵隐逸，放旷烟霞，琴韵入山水。展品中，有民间刊印的《五知斋琴谱》，古琴大师管平湖手写的减字谱，还有宋末浙派琴家郭沔的《潇湘水云》、毛敏仲的《樵歌》等曲谱……

溥忻、管平湖都在文革狂飙中离世，正是老一辈琴人的艰辛付出和守护，使得历经磨难、濒临绝境的古琴艺术得以传承……

据悉，此特展为期两年（从2025年5月23日至2027年5月22日），每半年更换一批古琴展出，古琴博士纪志群等琴家定期驻场演奏。

我是去年父亲节（2025年6月15日）那天下午去看展览的，正赶上八音乐坊的孙莘钰老师在此演奏，听众很多，不少是全家老小都来了。草编蒲团坐垫不够用，前排小朋友干脆席地而坐，我旁边坐着一位鼻梁高耸的蓝眼男子，手托下巴凝神倾听……

傍晚，在博物馆楼下还有一场古琴讲座，门口排了长龙。我很好奇，想了解更多。瘦高青年走过来摇头说：“抢不到名额了。”我身后的圆脸女孩讲，她前两天报名就已额满，可还是想尽量争取这个触摸实体琴的学习机会。她从小就吹笛子，家里笛子、箫一大把。前两年学了古筝，今年打算学学古琴。

跟工作人员一番交涉后，滞留在门外的我们也终于入场了。呵，有二十多人，三两个人共享一把琴，轮流换位弹奏。一袭蓝袍的孙莘钰老师

边讲边示范，课堂气氛松弛又活跃。本地华人居多的学员中，还有金棕卷发、小麦肤色的洋妞，笑容和蔼、彬彬有礼的日本老夫妇……

古琴独特的构造蕴含着古人对天地五行、自然岁月、宇宙万象的认知。老师讲，古琴的三种基本音色，泛音如天籁，按音像人语，散音则同大地，天地人三籁合于一身，非同凡响。随着人生阅历和文化内涵的增加，会对古代琴曲的意境有更深感触与理解。

老师教大家学习基本指法和减字谱。投影幕上呈现古装戏中的弹琴画面，学员们踊跃发言，指出古琴摆放和弹奏姿势的错误。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还齐奏了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学员们非常开心，热情高涨，边弹边唱，豪气又洒脱，超时了也久久不愿离去，乐不思归地继续弹奏，兴致盎然……

意犹未尽的我，几天后又重返博物馆古琴展，细看静品；陆续查阅了很多资料。8月16日下午，亚洲博物馆举办“听琴说：以琴会友”的活动，我和百余名观众一起聆听了王甜甜、王亚帅、宁晓静、纪志群演奏的《梅花三弄》《庄周梦蝶》《流水》《忆故人》等古琴名曲，感受那种舒缓静远又飘逸的妙境。

9月23日晚，在博物馆策展人林家铭博士主持的“音景、乐器旋律的古琴世界”对谈中，本地艺术家纪志群先生说：“古琴是超越时代的乐器，是与心灵对话的写心之琴，是修身养性的载道之器，有着细腻的情感表达和高雅的文化审美。”他认为，古琴曲流传千年的旋律，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之所以引发古今共鸣，因为人性的

本质是相通的。

纪志群是首位获得中国古琴研究博士学位的演奏者。回顾以往，他颇感幸运，遇到良师，研习经典，“没走过一步歪路。”纪先生现场弹奏的是名叫“坐忘”宋琴，人与琴的缘分妙不可言，暗合冥冥之中的传承使命。

纪志群曾“离群索居”12年闭关打谱，潜心完成了明末清初虞山派琴宗徐上瀛《大还阁琴谱》全书32曲的激活与重建。“清末以来，像管平湖先生等，至少三代人都在梳理古人的作品。”他讲，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实从明代开始，古琴艺术就从创作渐变到述而不作。艺术都是金字塔型的，对古老传统有很深的了解，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有创作的高妙。

他建议古琴爱好者“以古为师”，一定要弹古曲、著名琴家的打谱，多听“老八张”CD，不要随波逐流、跟着流行跑。“以诚意正心去感知古人的精神境界，从而升华自己。让指下，扫尽一切喧嚣之气；让弦上，仅存贞洁之美。”这是他坚守的雅正琴道。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千百年来，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古琴，所到之处是诗意栖居的文人风采。弦歌雅韵润狮城，钟灵毓秀，美哉幸哉！

《听琴说：音乐、工艺传统与文人精神》

展馆：亚洲文明博物馆

展厅：二楼中国士人文化展厅

时间：2025年5月23日至2027年5月22日

(作者为本地文学艺术爱好者)



父亲节那天下午，孙莘钰老师在演奏，前排小朋友席地而坐听琴，乖萌可爱



8月16日下午，在亚洲博物馆举办的“听琴说：以琴会友”雅集中，纪志群博士演奏古琴名曲《潇湘水云》



绕圈

文·王妍柔

我抵达学校大门前的巴士站时，已是接近十一点的深夜。身体很轻，头很重，有些事情在脑海里打结。如行尸走肉似的，我睡眠惺忪，拖着自己过了大门。通常我只需要步行约八分钟，就能抵达宿舍门口。但是这个时段，路上可能会有一些不速之客。

有可能是它们怕热吧？所以夜晚的时候才会出现。步行约两分钟，我就抵达了保安亭。值班的保安在保安亭休息，偶尔会去巡逻，从来对于周边的流浪猫们都不爱搭理。

视线有了一种寄托，不知不觉地我停了下来，默默地看着它们。我感受到保安的眼神，我没有搭理他。

这些猫都是橘猫，有几只比较小，还有一

只较大。较大的那只腹部下垂，感觉是怀孕了，可能是母猫吧。它和其他小猫不一样，平常就喜欢趴着，动作缓慢，偶尔还会打个哈欠。其他小猫看见我后，都撒着小腿嗒嗒哒哒跑了。反而母猫对我眨了下眼睛，然后慢悠悠地起身。我在原地蹲下，母猫则一步一步地走向我。她也不看我一眼，径直绕到我的身后。我感受到它的躯体蹭了蹭我的后背，毛茸茸的感觉，我抖了一抖。当它绕回我的视线范围时，又用头部蹭了蹭我的膝盖。

它就这样绕了几圈，我就这样让它绕了几圈。

该我了吧？我抬起左手，停在它头部上方的半空中。它感受到一些动静，往上一瞥，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脸。我当它是答应了，便摸了摸它的脑袋。听说猫很喜欢人类揉揉它们的耳后，我便顺势地把手往下移，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挠着它的耳后。原来猫的脑袋这么小，毛很顺。它也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呆滞地望着远方。

再后来，它的脚又开始往前迈，我触碰着它的手随着它的移步，顺着抚摸它的颈项和后背。它又默默地绕着我转了几圈。我陷入了沉思。你说，它绕这么多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蹲累了，我慢慢地站了起来。母猫看了我一眼，围着我的鞋子又绕了两圈，悄然无声地走回保安亭旁窝着了。我和它挥挥手，它只是看着。我走远了，它只是呆着，偶尔舔舔毛，一点儿也不留念。

可能我们都只是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了一些什么吧？

林高评语：

看似没有什么转折，没有戏剧性的情节，结尾却留下了回味的空间。意蕴含蓄。“可能我们都只是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了一些什么吧？”一句有点睛的效果。“我”与猫似乎作了一段交流，人与物之间透过某种关爱的形式，似乎可以能够对话。开头写到“我”感到疲惫，显然情绪不佳，若能多一点点关于情绪的描述会更好——对应结尾来看，“我”是想要从猫的身上取得一点暖。文字简洁顺畅，甚好。

迷离

文·刘锦汶

星期一，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窗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和她即将重获自由的心境形成强烈对比。

她终于要摆脱生活中的迷离了。

她看着那张摆在梳妆台前的全家福，莞尔一笑。这个笑，是为了谁而笑呢？这个全家福还有什么让她值得留念的意义吗？孩子也都长大成人，展翅高飞了。她得放手让孩子们闯，也脱离束缚自己的枷锁。难道孩子们就是她的枷锁？

自从那天事实摆在她眼前，使她迷离——然而，终于要断。

她走去衣柜，将他的衣物、随身用品等拿出，帮他放进行李箱——这是给予他的最后一点温柔。你对我那么残忍，我还能这样帮你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

嗯，他还没回来——是不会再回来了。

她很清楚这个事实。正因为她很清楚，所以下定决心，改变自己如此迷离的人生。送你走，还我清净。

她还帮他整理了其他物品，一个也不留的塞进他的行李箱。反正他的行李箱那么多，家庭旅行的一个、出差的一个、回娘家的一个、回家乡的一个，还有始终不回家的那一个。

说来讽刺，他的全部东西居然连一个家庭旅行的行李箱都塞不满。他到底对这个家有多少心？想到这她都不禁苦笑，我还得帮你掩盖事实，有病吧我。

家里空无一人，屋子虽大却空荡荡——毫无生气。至少你走了我会朝气蓬勃一些。

她眼看时间差不多要到了，你要回来了。她把所需的所有文件都准备好，放在客厅的桌上。她坐在沙发，开电视，看两人曾经最喜欢看的爱情片。

她望向墙上的时钟，下午一点，正是你每次回来的时间。

大门开了。

他带着那个行李箱，还不如不要回来？不

行，她今天就是要干正事。

她二话不说，向他展示桌上的离婚协议书。

他拿起那份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除了屋子还有孩子们的抚养权以外，什么也不需要，也不需要他的赡养费——毕竟这也是你期待已久的。

他看着文件，良久无语。他静默了好久、好久，才吐出一句：“你终于决定要离婚了吗？纠缠了那么多年，你终于舍得还我自由了？”

她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他一直认为她在绑着他。对，她必须这么做！为了当时羽翼未满的孩子，还有为了社会上的形象，她不得不这么做。但现在该担心的已经过去，她对社会还是会有个正常的交代。她必须放手一搏，为自己拼一次。

我们明明知道事情的原委不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必须伪装。

他二话不说，直接在协议书上签字。瞧你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已经把他的行李箱都收好放在饭桌旁，你拿走的。这一走，比你给我的一切还要多。

他就此告别这个家了——这个真的是你的家吗？

明明那个男人的住处才是你真正的家。

自从那天发觉到他和那个男人，斗胆在床上……她就深感迷离了。她也很清楚，他每次带那个行李箱出门，代表什么意思。

她回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窗外仍然下着倾盆大雨，但她重获自由。即使梳妆台的全家福她仍然留着——孩子们还在。

她终于摆脱了。

林高评语：

用她的视角叙说两个人的故事。有婚姻，有个家庭，有子女，但没有爱情。她必须隐蔽不堪的局面发生，又必须掩饰内心痛苦。其实，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彼此都受着苦。离婚协议书，黑体字道出了心中的感受。“你对我那么残忍，我还能这样帮你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从她的角度看，振振有词，她确实牺牲了自我，成就了孩子，保护了声誉。然而，她终于决定走出如此迷离的生活。也许读者会问，她做对了吗？结尾留下给读者的，正是有待解读的疑惑吧。



烟火松柏 记一条老街的余温



文图 · 黄义强

松柏街（原名南京街上段，Upper Nankin St），这条与豆腐街（原名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命运交织的老街，终究在城市重建的推土声中悄然隐没，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回忆，在人们心底缓缓回荡。

松柏街与豆腐街毗邻。位置大致位于今日的芳林熟食中心、福海大厦与芳林苑之间。在女性劳动群体中，这里的“三水红头巾”人数仅次于豆腐街；其他妇女多在树胶厂剪胶，或在街边摆摊谋生。男性则多从事机械、木工等行业，也有不少投身于各类手工技艺之中。

据《联合早报》1987年5月3日“根”系列的介绍，松柏街的名称源自一段少为人知的往事。早在1877年，当时依法登记的十个华人私会党中，有一支客籍帮会名为“松柏馆”，其活动据点便设于此街。后来，这条街便以“松

柏”命名，街名悄然承载起一段隐秘却真实的历史印记。

松柏街的建筑多为两层或三层高的店屋，错落排列。每层楼往往挤住了五、六户家庭，而整栋楼仅设一个位于底层的共用厕所，卫生条件颇为简陋恶劣。有些两层楼的屋内还巧妙加建了一层阁楼，俗称“假三楼”，虽不外露，却凝聚着老街坊因地制宜的智慧与别具一格的空间美学。底层多为店铺，经营着各式生意；一栋楼屋承载着生活与生计，商业与居住在此自然交织，浑然一体。

我出生于松柏街，在15岁那年因城市重建而搬离。犹记得当年自新桥路（亦称“大坡二马路”）转入松柏街，街角左侧是一位印度大叔的小摊，街坊亲切地称之为“Mama Stall”（“Mama”在印度语中意为大叔）。摊位虽小，却陈列着琳琅满目的零食、常用药品与杂志

报纸，井然有序，是街坊生活中熟悉而不可或缺的一隅。街角右侧则是一家名为“福南”的玩具店，橱窗里常年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吸引无数孩童驻足，目光中满是童真的好奇与憧憬。

继续深入街内，两旁楼底的各色店铺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生活长卷。新民理发店、替人代写家书的大叔摊位、以独门中药配方调制“固命丸”的黄伦记药行、兆利隆、大通行、公益庄、胜昌隆夹万店，以及在墙壁上悬挂着“蔡朗三”招牌的中医师住所，还有广和兴酱油铺、虾饼制作坊、炭铺、松柏药行、先施化妆品店、一鸣药行、东方胶品厂及振泰参茸行。另一侧有中兴纸行、南安药行与广仍利……

这里还有一家酒铺，售卖五加皮、米酒、红舌狗等酒类，由一位光头大叔与他的太太经营。店里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每逢电视台播放香港武侠电影如《如来神掌》时，店主便会应景推出自制的冰凉酸柑水或红豆水，每杯一角钱。顾客支付后，便可坐在长形矮凳上，边品饮料边沉浸在武林世界的光影中。此外，还有一家卖零食的小店，住着一户人家，暗中代收“十二支”赌注。

在所有店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数一家名为“范枝”的罗厘出租店。每逢周日，若罗厘尚未被租出，总会泊在街边。此时，我们这群顽童便如脱笼小猴，在罗厘间自由穿梭、攀爬追逐，嘻哈打闹。然而，唯独那辆编号4号的罗厘，我们从不靠近，更不敢爬上，因为它的用途与众不同，它是豆腐街多寿殡仪馆专门用来运送棺材的灵车。

松柏街的街边小吃，从清晨到夜晚，总是热闹多彩。每天早上九点左右，街角那家福建虾面摊便推着小车登场，浓郁的虾汤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令人垂涎。巷子里的咖啡摊也开始忙起来，南洋咖啡的浓郁醇厚，伴着微风，共同谱写出这清晨独特的序曲。经常还会有一位头顶藤篮的印度小贩，沿街叫卖印度白米粉，那种要沾上黄糖和椰蓉才一口吃下的香甜滋味，是孩提时代的奇妙记忆。

到了十一点左右，卖豆腐花的小贩来了。

偶而妈妈会吩咐我提着小容器，用一角钱买一份不加糖的豆腐花带回家。妈妈会淋上几滴酱油，再拌进热腾腾的白饭里，滑嫩的豆腐花混着米香，简单，却好吃得让人心满意足。

中午时分，“好味”的吆喝声在骑楼下此起彼伏，潮州大叔卤鸭的香气悠悠飘散，一家区姓人家也架起摊子的遮阳伞，开始售卖红豆冰，凉意在热浪中悄然铺开。此时，小贩们也如约而至：有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牛肉丸与牛肉粉，有人骑着叮铃作响的三轮车，售卖冰淇淋；也有踩着脚踏车的摊贩穿梭其间，贩卖香气四溢的水糍。街角飘来烤鱿鱼与豆干包的味道，还有小贩高声叫卖着椰子咖喱面包。

邻里老婆婆天天变着花样在路边摆摊做些小吃：炒米粉、花生粥、咸甜“薄撑”、番薯蛋等广东小食，价廉味美，是这条街最温暖的午后风景。

傍晚4点半前后，一辆卖酿豆腐的手推车停靠在街边中央处，接着是骑着三轮车，按着小喇叭卖椰子面包的印度大叔。水果摊贩也开始将新鲜水果整齐排开，略有瑕疵的部分被切去，以平价卖出。其冰冻“沙梨水”，甜入心扉，是孩子们最爱的饮品。

夜幕低垂，街口不时有流动广播车停靠，以宏亮的播音声兜售各家的药油，有红花油、豆蔻油、呃牙仔海狗油、拳头油等。忽然，一阵铜锣声响起，卖生草药的江湖郎中也来了。街头的夜静，就这样被一点点惊动。

到了九点过后，又有一辆专卖武夷茶鸡蛋和冰花炖鸡蛋的三轮小推车缓缓路过，偶尔还会见到一位老妇人挎着篮子，轻声叫卖糯米糍。

松柏街的一天，在夜色中缓缓收笔，如一幅水墨画，静谧而悠长。

时光荏苒，松柏街终究隐没于城市的版图之中，但那份烟火气与人情味，依然深藏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化作一抹难以磨灭的温暖印记。纵然城市不断更迭，那些关于日常与童年的片段，仍会在心底泛起微光，悄然见证一个时代曾有的温度与回响。

（作者为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学生）

德普路

南部山脊军需仓库的层叠记忆



文图·李国樑

德普路 (Depot Road) 组屋区是个隶属于红山镇五个组屋区中较新的小区，20多座组屋居住着1200多户人家。

德普路是一段从亚历山大路 (Alexandra Road) 延伸至亨德申路 (Henderson Road) 的横贯道路，依偎在直落布兰雅山的北侧。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两公里路所隐藏的记忆长河，融汇着从百年前殖民地弹药基地到新加坡独立后的小型工业地带，再到今日融合住宅、艺术与自然的城市空间。

从军需仓库到民生

Depot Road 的名字，源自英国陆军的中央军需仓库 (depot)。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南部沿岸建立一系列军事设施，以支援港口与驻军的运作。南部山脊一带被视为后勤枢纽，亚历山大军营、吉门营房与德普仓库相互连接，形成一条完整的补给网络。

那时的德普路沿着山脊蜿蜒，周围环绕着红土坡与密林，来往新马的火车在附近穿梭。对

一般民众而言，这是封闭的军事区域；但对英军与本地劳工来说，这里是一条维系军事机器的动脉。二战后，这里的军事用途逐渐减弱，路名则被保留下来。

德普仓库内的弹药库区位于隐秘的角落，四周被茂密的植被环绕。1969至1971年间，卡鲁 (Karunakaran N K P) 曾经在那里值勤，两人一组沿着弹药库区的道路巡逻。那里蛇特别多，夜间尤其阴森诡异，风吹竹林，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连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在脚边滚落，都令人胆战心惊。

70年代初，由于直落布兰雅住宅区的开发，这一带开辟多条道路，亨德申路则从德普路延伸至直落布兰雅路 (Telok Blangah Road)，将原来的花柏山分成两边，一边保留花柏山的原名，另一边则称为直落布兰雅山。如今亨德申波浪桥将两座山丘重新连接起来。

喜欢探密的人士，可以寻访这一带的《小娘惹之翡翠山》拍摄现场和丹麦海员教会 (Danish Seamen's Church)。教会的前身为金钟大厦，陈武烈 (陈笃生曾孙) 以祖父陈金钟之名作为别墅命名。这座20世纪初英国新乔治王式建筑融合各国风情，例如钟型屋顶采用金黄色法国长砖，一楼铺设富裕家庭常用的花纹地砖；二楼地板与梁柱则使用西澳珍贵的血檀 (Jarrah wood)，落

成不久后还让孙中山入住。

1960至70年代，新加坡大力推动工业化期间，德普路迎来轻工业区身份，吸引金属加工、电机修理与运输企业进驻。

80年代，亚逸拉惹高速公路（AYE）的修建，为这区的民生地貌带来巨变。新道路提升连通性，许多原居民迁入德普路的新组屋生活。

早年生活：山坡上的甘榜与宿舍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城市人口剧增，殖民地政府开始在市边缘兴建公共设施与住宅。德普路周边虽仍带着军方色彩，平民聚落却已逐渐出现。那时的德普路，军事设施与民间生活共处于同一片草坡，英军宿舍坐落在山坡上，山脚则散布着木屋、菜园、工寮与小商店。沿路有修车铺、钢铁厂、脚踏车行和卖冰球的小贩。

居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生活简单的年代，混合着机油、泥土和海风的气味。马来妇女在家门口晾衣，华人木匠修理家具，偶尔还能听到军营的喇叭声。就如一位前居民说：“德普路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一边是军人，一边是我们甘榜人。后来新组屋建起来了，但山风和树影都还在身边。”

由于德普路地势比较偏僻，土地归属复杂，因此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半乡村状态，不像红山的其他组屋区那样迅速发展。延迟的现代化，让它保留比城市其他角落更久的自然光景。

城市生活的成型

80年代末，建屋发展局启动德普路组屋计划，借助山坡的优势来融合居住与消闲功能，直落布兰雅山的步道，成为居民跑步与散步的路线，每天早晨还可见到三五成群的太极拳爱好者打拳、耍剑、舞扇，音乐声此起彼落。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山居”案例，可说是当代新镇不可或缺的“绿野芳踪”雏形。

德普路组屋的兴建，象征德普路居民正式迈入现代生活。小型购物中心与食阁成为日常生活重心，杂货店、诊所、咖啡店与小贩摊位构成小区生活的肌理。

宗教庙宇

德普路上的印度庙、齐天坛道教庙宇与三江公祠处于相邻地段。露丝拉·迦梨安曼兴都庙（Sri Ruthra Kaliyamman Temple）的出现，可追溯到百多年前亚历山大砖厂的造砖岁月。在砖厂工作的印度劳工设立神龛，过后业主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为他们兴建一栋砖屋来进行宗教仪式。随着70年代砖厂结业，信徒筹款募捐，在德普路现址兴建新庙宇。庙宇的多用途礼堂，是信徒举办结婚典礼的热门地点。

在众多印度教女神中，迦梨女神被视为最负盛名的女性神祇，受尊奉为神圣之母、宇宙之母。迦梨被描绘为黑皮肤、长发凌乱、赤目如火、舌头长而下垂的“狂野”形象。她赋予信徒



自由，只要信徒以“孩童般的姿态”前来，她便会庇护他们。

至于三江公祠，两层中式庙宇内设神坛与先人骨灰厅，寄托三江人慎终追远的精神与同乡情谊。

19世纪末，三江人以惹兰里茂（Jalan Rimau）的公墓起家。那时候的三江，指的是浙江、江西与江苏三地同乡。1906年创立三江公所时，购置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屋宇为会所，三江的地理范围相应扩大，包含长江、黄河、黑龙江流域。新加坡独立后，坟山与会所相继被征用，会馆通过政府赔偿与会员捐献所得，兴建三江公祠。

吉门营房：从军人到艺术家

吉门营房（Gillman Barracks）建于1936年，原为殖民地时期英国驻军营区。白墙红瓦、宽阔的草坪，曾是军人与家属生活的场景。近年来，政府将它改造成当代艺术聚落，汇集画廊、艺术和餐饮设施等多种用途。

吉门军营的转型，是新加坡“旧地新用”的代表案例之一。吉门营房的独特之处在于由多个营房组成的建筑群，保留较完整的旧时风韵。

从军营到艺术村的转折，也映照德普路的整体变化：从实用功能到文化象征，从封闭的空间到向公众开放。漫步其中，殖民地建筑与现代艺术似乎正在进行无声对话。

目前租户的租约最迟于2030年陆续到期，当局正在探讨日后在这个地段建造容纳组屋和私宅单位的新住宅区。由于近年来，国人对市区边缘住屋的需求不断增长，附近的吉宝俱乐部旧址将发展为住宅区。与吉宝俱乐部旧址相隔一条马路的吉门营房，可视为此南部濒水区的扩展。

吉门营房的建筑群主要集中在洛克路（Lock Road）和马来路（Malan Road），周围是一片树林，以及新加坡教师学院（前圣安德烈初级学院）和巴西班让职业专科学校旧址。建筑保育者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前学校与部分树林空间，让住宅区围着吉门营房而建。至于日后的具体变化，让我们共同见证。

友谊山一带的民宅与学校

吉门营房旁的普勒士顿路（Preston Road），有个消失的友谊山（Friendly Hill）民宅。虽然地名称为“友谊”，但由于居住空间有限，容易引起邻里纠纷，居民曾为了芝麻绿豆之事而闹上



亨德申波浪桥将花柏山和直落布兰雅山重新连接起来



丹麦海员教会的前身为金钟大厦，陈武烈（陈笃生曾孙）以祖父陈金钟之名作为别墅命名



1980年代末，建屋发展局启动德普路组屋计划，借助山坡的优势来融合居住与休闲功能



三江公祠与齐天坛庙和露丝拉·迦梨安曼兴都庙（Sri Ruthra Kaliyamman Temple）咫尺为邻



建筑保育者建议利用新加坡教师学院（前圣安德烈初级学院）与部分树林空间来规划未来的南部瀕水区住宅



吉门营房的建筑群

法庭。负责审理的朱星法官幽默地说，虽然两人住在友谊山，但长久以来彼此之间一点都不友善。他判处向对方丢石子的一方罚款10元。

友谊山民宅消失后，原地改建成校舍，曾经有多所学校轮流入驻，例如：

- 1974年成立的达善中学（Henderson Secondary School），开学时录取600名中一学生。两年后，达善中学迁入亨德申路的新校舍。

- 1975年，新成立的美景中学开办12班中一班，与达善中学共用友谊山校舍。

- 1977年，奋力小学迁入，1978年底与更生小学和史达拉摩小学（Strathmore Primary School）三校合并成为更生小学，新联合学校迁到亚历山大路，校名为更生。

- 1979年，友谊山职业专科学校（Friendly Hill Vocational Institute）开办商科与簿记课程。

- 1981年，新加坡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ingapore）将原址发展成五所校舍，开办小学至高中课程。

1983年，华义中学从玛格烈通道（Margaret Drive）迁至德普路，原址为现在的惠普企业亚太与日本区总部（HP Enterprise）所在地。谢甦是德普路华义中学的首批中一生，他表示当时学生的身份混乱，对新校园缺乏归属感，还好有Mr Raja等老师以校训“仁义智群”来谆谆善诱，让同学们度过充满挑战的中学生涯。

华义是1950年代学潮期间，最早开课的三间政府华文中学之一，其他两间是德明和德新。1979年，华义从华文源流转型为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授课的学校。迈入21世纪之际，该校在裕廊西建立新校园，并保留华义校名和部分教职员工。

国防科技局

德普路最显眼的，莫过于两栋高耸的国防科



即将走入历史的德普路轻工业区古老建筑

技局楼（Defence Technology Towers），这里就是昔日军需库的原址。笔者服役时，曾带领后勤人员到此领取弹药；从事正业时亦在此上过班，见证时空的变化。

国防科技局的原身是1966年成立的三人技术后勤部门，专注于装备采购工作。国防工业（Defence Industry）与新加坡国防科技研究院国家实验室（DSO）分别在1967年与1972年设立，三者形成国防科技集团（Defence Technology Group）。

国防有许多不可告人的机密，也是一条经济生产链，因此各国都会投入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实力。近年来通过新科工程（ST Engineering），以出口战舰、陆战武器和为外国提升运输机性能等方面向国际市场进军，都是重要的突破。

或许对公众人士而言，最熟悉的就是日常所见的红外线体温测量器（Infrared Fever Sensing System）。它是在2003年沙斯病毒爆发期间，由国防科技局与新科工程携手完成的系统，这项将军事仪器转型为商业用途的发明，如今在机场与各检查站仍然见到它的身影。

纵观德普路的变迁，殖民地时期的军需仓库，象征外部秩序的建立；工业时期的厂房，体现

国家现代化的雄心；而当下的住宅与艺术空间，则承载着新的城市身份。

南部山脊将德普路纳入更大的生态网络，经过不同阶段的叠合，钢筋水泥与自然绿意相互交融。过去与现在同处一个空间的德普路，显得更加立体化。

参考文献：

- [1] CHIA, Soo, Michael 谢甦, 25 Jun 2025,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Legal System, Accession Number 005121, Reel/Disc 8.
- [2] Keynote Speech by President of Singapore Dr Tony Tan Keng Yam at The Defence Technology's 50th Anniversary Dinner, 7 November 2016.
- [3] Lam Chun See, Ammo Base @ Depot Road, Good Morning Yesterday, <https://goodmorning-yesterday.blogspot.com/2009/09/ammo-base-depot-road.html> accessed on 28 October 2025.
- [4] Sri Ruthra Kaliyamman Temple, <http://ruthrakali.org/> accessed on 3 November 2025.
- [5] THE NEIGHBOURS, The Straits Times, 7 June 1956, Page 4.
- [6] 刘家明, “当年华校的除名与保名”, 《联合早报》2014年4月17日。
- [7] 三江公祠, <https://www.samkiang.org/>三江公祠/, accessed on 3 November 2025.

题图说明：

1950年代德普路一带的地形：图中的山脊是直落布兰雅山，右方与下方的建筑群是吉门营房，左上方的建筑群是德普路中央军需仓库（图源：Royal Air Force 1958,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Depot Road: Layers of Memory in Singapore's Southern Hills

Depot Road is a short stretch of road located in Singapore's southern region, yet it encapsulates the larger trajectory of the nation's urban evolution. Nestled on the northern slopes of Telok Blangah Hill, this two-kilometre stretch has evolved from a colonial military logistics hub into a blend of residential areas, arts and green space. Its narrative encompasses not merely one of physical re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eras that has shaped a complex urban identity.

The name "Depot Road" originates from its earliest function as part of the British army's central military supply depo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long the southern coast of Singapore. Ammunition depots, barracks and camps, like Alexandra Barracks and Gillman Barracks, were interconnected in a hidden yet essential logistical spine. For civilians, this was largely a restricted zone; for soldiers and local labourers, it served as a lifeline supporting imperial military operations.

As Singapore progressed towards self-governance and independence, Depot Road underwent a transitional phase. Between the 1960s to the 1970s, industrialisation transformed the area into a light industrial zone featuring metal workshops,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and repair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kampong homes, vegetable farm, workers' dormitories and small businesses appeared along the slopes and foothills. Military bases, civilian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operations coexisted within the same environment. This coexistence imparted a distinctive character to the area - neither entirely urban nor rural, marked by the odour of engine oil, moist earth, sea breeze, along with the noises of workshops mixed with distant bugle calls from nearby camps.

In contrast to other areas of Bukit Merah, Depot Road urbanised at a slower pace. Its uneven terrain and complicate land ownership delayed large-scale redevelopment, thereby enabling greenery and semi-rural living to continue longer than elsewhere. This "delayed modernity" eventually served as a benefit for planners as it allowed them to integrate housing with nature rather than eliminating it entirely.

By the late 1980s, the HDB initiated the Depot Road public housing project. New flats introduced residents to contemporary high-rise living, with the hills nearby serving as recreational and ecological areas. Walking trails, morning Taiji sessions and informal social interactions on forest paths became integral to everyday life. Depot Road thus appeared as an early example of what could be called "urban hillside living", where dense residences coexist with easily accessible green spaces.

Religious and community institutions further enhance the area's social fabric. Hindu temples, Taoist shrines, and clan associations stand side by side, reflecting Singapore's pluralistic society. These institutions serve more than just spiritual purposes; they ground collective memory, migration histories and social networks that link current inhabitants to past generations of settlers.

Perhaps the most notable symbol of Depot Road's change is Gillman Barracks. Built in 1936 as a military base, it subsequently transformed into a contemporary arts hub, featuring galleries and creative spaces within preserved colonial buildings. This adaptive reuse signifies a shift from closed, functional spaces to open, cultural environments. Yet even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final. With potenti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under consideration, Gillman Barracks once again finds itself on the threshold of transformation, reflecting the ongoing evolution of the area.

The Defence Technology Towers, now situated on the former supply depot location, contribute an additional aspect to this narrative. From colonial supply chains to advanced weaponry, the area continues to meet national requirements, though i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ays. Some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rmal Imaging Screening Devices, were modifi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illustrating how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 an innovation-focused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ce of Depot Road is found not in any one feature, but in the various layers of meaning it holds. Colonial control, industrial aspirations, community life, cultural manifes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ll coexist within the same environment.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hillside corridor, the past and present engage in continuous dialogue. This provides the city with a richness that goes beyond just steel, concrete and glass.

《源》

“本土文学”栏目

为进一步推动本地文学创作，《源》杂志于2026年对“本土文学”栏目进行全新改版。栏目不再设立“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而改为全年常设征稿，持续征集小说、散文与诗歌作品，鼓励创作者以文字书写本土故事。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散文、诗歌（须为未曾发表、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小说、散文约4000字

诗歌约1200字（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录用：《源》杂志编委会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刊登。作品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声明：投稿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所有条件与规则，方可参与征稿。

欢迎广大文友踊跃投稿，以文学之笔，共同书写本土故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
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投稿方式 —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和邮寄杂志。

— 稿件录用 —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
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若想阅读更多往期精彩内容，请登录网站<https://sfcca.sg/yuan/>，或者扫描二维码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欧雅丽 电话：6354 4078 电邮：yali@sfcca.sg



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每学年可获得高达1万5000新元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6 – 10.07.2026

咨询 For Enquiries

☎ 6643 6475

✉ scholarship@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